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八十六本，第一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〇四年三月

## 從去思碑到言行錄——元代士人的 政績頌揚、交游文化與身分形塑

陳雯怡\*

本文以去思碑為起點，觀察元代士人頌揚政績的風氣、行為與意義。相較於唐代二十餘篇，宋代不足十篇，元代留下了超過三百篇的去思碑。去思碑（或稱德政碑、遺愛碑等等）是地方百姓或士人為紀念、頌揚地方官的善政而建立的。但去思碑不僅以碑的物質形式立於一地，塑造地方的集體記憶，也以文本的形式流傳於士人之間，成為個人的文件。本文將去思碑放在士人交游文化的脈絡中，觀察去思碑如何與其他頌揚政績的贈序、詩卷、記文等等一起作為個人「聲譽」的文字表現，並分析「歷官記」、《甘棠集》，乃至《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這些作品，探討頌揚文字如何形塑個人的身分意象。本文進一步連結頌揚政績與當時其他的頌揚行為，提出其關鍵是以「卷」為物質形式的「題跋模式」，而透過頌揚文化觀察其下士人社群的社交活動與社會網絡。

關鍵詞：元代 士人 去思碑 文體 社會網絡

---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本文為國科會（今科技部）補助之研究計畫（計畫編號：99-2410-H-001-051-）部份成果。

去思碑（或稱德政碑、遺愛碑、政績碑、惠政碑等等）是地方百姓或士人為紀念、頌揚地方官的善政而建立的。去思碑起源甚早，漢代以來即形成的紀功頌德碑可以視為其遠源，下至明清，未曾或絕，成為表彰循吏的一個重要形式，也是傳統「循吏文化」的一個表徵。就現存可見的去思（德政）碑文而言，相較於唐代二十餘篇，宋代不足十篇，<sup>1</sup> 元代則留下了超過三百篇的去思碑，數量差距極大。即使將歷代文獻留存多寡的因素加入考慮，元代去思碑之盛行，仍然是個令人注目的現象。<sup>2</sup> 從地方紀念碑的角度，去思碑（至少在形式上）代表一地民眾之感念，其建立的過程則可能涉及複雜的地方政治，亦關係到國家的政令約束。<sup>3</sup> 然而，如果從碑的性質為頌揚政績，以及碑文之作出自士人之手（例如，相對於個別百姓可自行設置的生祠）來觀察，元代大量的去思碑可以被放到另一個脈絡思考，即當時士人的頌揚活動。去思碑讓我們注意到元代其他體裁不同、產生脈絡有異，但同樣歌頌政績的文字，如記、傳、序、詩等等，合起來呈現出一個歌功頌德之聲盈耳不絕的頌揚文化。本文對去思碑的討論，不在其地方紀念碑的角色，而是以之為起點，觀察元代士人頌揚政績的風氣、行為模式及其意義。

去思碑的建立雖是一種由來已久、自成一格的傳統文類，但它在元代的表現同時是當時士人間政績頌揚活動的一部份。然而，如果碑石是百姓去思的載體，那麼這種頌揚活動存在的脈絡是什麼？從頌揚文本的流動可以看到，其底層有一元代士人的社會網絡在支撐。而如果去思碑是地方社會的紀念碑，那麼這種存在於士人網絡中的頌揚文本具有何種作用？此則須從當時士人間的交游文化來觀察。從士人社群的角度，政績頌揚不僅是頌揚者與被頌揚者兩端間的關係而已，更關係到個人在群體中的評價，因此既涉及建立名聲的社會網絡，也涉及詮釋名

---

<sup>1</sup> 關於唐代的德政碑，可參劉馨珪，〈從生祠立碑談唐代地方官的考課〉，高明士主編，《東亞傳統教育與法制研究（二）》（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頁 241-284；〈從唐代「生祠立碑」論地方信息法制化〉，《法制史研究》15（2009）：1-58。宋代參劉馨珪，《唐律與宋代「法文化」》（嘉義：國立嘉義大學，2010），頁 85-96, 136-171。

<sup>2</sup> 唐代文獻留存確實較有限，但就今人所編《全宋文》三百六十冊與《全元文》六十冊比較，宋代文獻數量尚遠過於元，說明今存去思碑之差距不能簡單用傳世文獻數量來解釋。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sup>3</sup> 唐、宋時期相關的法令，劉馨珪前引文有仔細的研究。元代的部份與唐宋有關鍵性的差異，是當時去思碑大盛的因素之一，參陳雯怡，〈從朝廷到地方——元代去思碑的盛行與應用場域的轉移〉，《臺大歷史學報》54（2014）：47-122。

聲的群體文化。通過對元代頌揚政績文字的分析，本文試圖探討的是元代士人社群文化的一個面相。

過去對元代士人的關注，主要在其政治處境的變化。相對於宋代科舉制度所形成的新興士大夫階層，蒙元時期的漢族士人，在「征服王朝」的新體制中，失去了原本主要的仕宦途徑與優勢。<sup>4</sup> 南宋遺民「九儒十丐」之說，往往被徵引作為元代士人地位低落的證明。<sup>5</sup> 蕭啟慶首先從儒戶制度的研究說明元代士人的境遇不算太差，只是仕途升遷的限制較大，與其他諸「教」並列，不再具有獨尊的地位。<sup>6</sup> Frederick Mote 指出士人仍然是社會、文化的精英與地方的領導人物，並提出「精英角色擴散」(diffusion of elite role) 的概念：傳統精英跨出他們熟悉的領域，加入他們原本較少參與的世界，從而在社會或文化上都產生許多變化。<sup>7</sup> 在文學、藝術的領域，元雜劇、文人畫便是元代特別突出的成就。<sup>8</sup> 然而，對於元代士人在新環境中整體的行為模式，目前的研究仍然相當有限。例如，「隱」是理解元代士人一個常見的框架，無論「不仕」是對元代環境主動的反抗或被迫的退處，也無論「隱逸」是對生活形態的描述或是個人志向的表達；<sup>9</sup> 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元代士人爭相求仕、干謁攀附的奔競風氣，常為時人所詬病。除了從個人的處境與抉擇這種個別因素來解釋，如果我們觀察整體文化的表現，這兩種對立現象背後共通的結構是，元代士人在蒙元政治社會情勢下的表現與回應。而同樣貫穿兩者的，則是士人間的交游文化模式。「交游文化」可說是元代

<sup>4</sup> 關於元代政治結構與士人政治地位的詳細研究，參王明蓀，《元代的士人與政治》（臺北：學生書局，1992）。

<sup>5</sup> 謝枋得著，熊飛等校注，《謝疊山全集校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卷二，〈送方伯載歸三山序〉，頁 29-30。

<sup>6</sup> 蕭啟慶，〈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氏著，《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頁 1-58。

<sup>7</sup> Frederick W. Mote, "Social Structure under Mongol Rul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ed. Denis Twitchett and Herbert Frank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638-640.

<sup>8</sup> 從社會文化史角度研究元雜劇的經典作品，參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元雜劇研究》（臺北：藝文印書館，1960）。文人畫可參何惠鑑，〈元代文人畫序說〉，《新亞學術集刊》4（1983）：243-257；石守謙，〈元代文人畫的正宗系統——由趙孟頫到王蒙的山水畫發展〉，氏著，《從風格到畫意：反思中國美術史》（臺北：石頭出版公司，2010），頁 167-180。

<sup>9</sup> 例如何惠鑑，〈元代文人畫序說〉以「隱」作為貫穿有元一代的主題。關於元代隱逸，參 Frederick W. Mote, "Confucian Eremitism in the Yüan Period," in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ed. Arthur F. Wrigh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202-240.

士人在承繼宋代士人社會的基礎上，因應蒙元體制而發展出來的核心特質。近年來，學者已經注意到從「社會網絡」來分析元代士人的文化表現。<sup>10</sup> 就個體而言，社會網絡是一種資源，成為個人可以運用的聯繫，其人際互動的面相，則提供個人生命如何受到影響的線索；就整體而言，其連結的性質與形態則展現了士人作為一個集體的一種結構。本文討論的並非個別、具體的人際網絡，而是社會網絡所蘊含的人際互動（「交游」）及行為模式（「文化」）。通過頌揚文字盛行的現象，本文希望呈顯出元代士人間一種重要的網絡連結形式：「社交文字」中的「題跋模式」，並進而觀察此種交游文化對元代士人社群的意義。

本文的主要取徑是探索作品之下的活動及意義。元曲之外，元代的詩文表現過去不太受到重視，彷彿僅延續宋代的形式，卻缺乏如宋代般耀眼的表現。<sup>11</sup> 但如果我們不從作品的文學性，而是把作品視為一個寫作活動的結果，我們會發現，有些文體（例如贈序）或文類（例如碑體中的去思碑或世德碑）在元代特別盛行，<sup>12</sup> 而它們反映的社會活動與文化價值便透露出一個時代的特性。本文由此一對「文體」的觀察與思考切入，收集各種與政績頌揚相關的文體，探討這些文體間相互的關聯，以及它們集合起來的形態，並從「總集」的發展分析其性質與意義。放在「社交文字」的脈絡中，觀察其下的社會網絡與士人社群。

---

<sup>10</sup> 蕭啟慶，《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第三章「社會網絡」（頁 37-186）以多族士人間的交往為主題，分析同鄉、姻戚、師生、座主門生及同年，以及同僚等各種人際關係。申萬里，《理想、尊嚴與生存掙扎——元代江南士人與社會綜合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第六章「元代江南士人的社會網絡——以郭畀、戴表元為中心的考察」（頁 244-287）以詳細的統計為基礎，分析了郭畀與戴表元社會網絡的特點與變化。從交游或社會網絡來研究元代文士的書畫或詩文表現，如石守謙，〈有關唐棣（1287-1355）及元代李郭風格發展之若干問題〉，《藝術學研究年報》5（1991）：83-131；陳德馨，〈從趙雍《駿馬圖》看畫馬圖在元代社會網絡中的運作〉，《美術史研究集刊》15（2003）：133-167。

<sup>11</sup> 參鄧紹基，《元代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頁 365；楊鑑，《元詩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頁 27。

<sup>12</sup> 贈序參 Wenyi Chen（陳雯怡），“Networks, Communities, and Identities: On the Discursive Practices of Yuan literati”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2007), chap. 4. 世德碑參飯山知保，〈金元時期華北的系譜承傳與碑刻〉，發表於中國宋史研究會、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華中科技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中國十至十三世紀歷史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十四屆年會」（武漢：武漢大學珞珈山莊，2010 年 8 月 19-21 日）。

## 一・由固定的碑石到流動的文本

去思「碑」以物質的形式矗立於一地，但碑「文」則可以脫離碑石而流傳，顯示去思碑之應用場合及意義的轉移。從地方社會的角度，去思碑是一地士民對去任官員之稱頌及懷念的表達；就個別官員而言，去思碑則是其仕宦過程中一份正面、具體的紀錄。本節將從「文本」的角度，探討碑的另一種存在方式，並由此觀察其他刻石碑記的頌揚性質。

### （一）去思碑的閱讀、題跋、流傳、引用

去思碑樹立於一地，不僅致邑民之思，也為來往過客所見。例如，元後期哈刺魯詩人迺賢（1309-1368）的《河朔訪古記》便載有其遊真定路時所見，當地為元初漢軍世侯史天澤（1202-1275）所立的遺愛碑：

真定路南關陽和門外史丞相遺愛碑一通，螭首龜趺，高四十尺，冠以華屋，壯麗崇峻，其文則郡教授吳特起撰也。碑畧曰：公姓史氏，名天澤，……其德可勝言哉。……十二月早渡滹沱河，抵陽和門外，日卓午矣，飯于旅舍，遂至南關下馬，讀其碑而去。<sup>13</sup>

此碑今不存，其內容僅見於迺賢之摘錄。除了史天澤的遺愛碑，《河朔訪古記》亦載有前朝德政碑，如唐清河郡王李寶臣紀功碑、漢柏人令徐君碑、唐柏鄉尉蘭君碑等。我們可以由此想見當時這些碑立於各地，成為地方景觀一部份的情景，如袁桷（1266-1327）所言：「余每過通邑大府，碑首高下，表植衢道，讀其行事……」<sup>14</sup> 而迺賢此例不僅顯示當時去思碑被閱讀的情形，透過如《河朔訪古記》般的轉錄，去思碑的內容也進而傳佈於他方。

去思碑除了親至其地的士大夫得以直接閱讀，還以文本的形式在士大夫間流動，從而有更多不受立石地點限制的讀者。透過題跋文字，我們可以觀察到此一流動的行為、方式及其意義。

<sup>13</sup> 元・迺賢，《河朔訪古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593冊），卷上，頁16上-17下。

<sup>14</sup>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收入《四部叢刊》〔上海：上海書店，1989〕，第230-232冊），卷二五，〈許州衡君去思碑〉，頁15下。

吳澄 (1249-1333) 有〈題郝令德政碑後〉一文，<sup>15</sup> 文中所言之德政碑，乃褒揚郝鑑任河間路獻州樂壽縣尹時之政績。吳澄文中提到，他之前即已聽聞郝鑑任御史之才幹，直到認識郝鑑之後，又從德政碑認識郝鑑此前治理一縣，深得民心的表現。吳澄並未明言他如何讀到此碑，不過，徐明善同樣題此德政碑，則直接說明是郝鑑本人「一日出示宰樂壽時邑人所樹碑」。<sup>16</sup> 此德政碑立於郝鑑去官之後，但顯然郝鑑也持有一份文本，而得以出示給其他人看。我們未必能就此推論郝鑑曾鼓勵或介入立碑的行動，但無疑地此碑之立令他深以為榮。郝鑑的德政碑並未流傳下來，吳澄和徐明善的題跋則是分別收錄在其文集中而保存至今，使我們得知曾有郝鑑的德政碑存在。我們可以推測，郝鑑也許曾出示更多人，有更多今已不存的題跋。如此，透過出示與題跋的行為，此碑不僅立於樂壽縣一地，以表達民之去思，也流傳在士大夫間，成為對郝鑑政績的一種介紹方式。儘管郝鑑在樂壽縣的碑現已不存，其部份內容則通過題跋保留至今。<sup>17</sup>

士人的題跋肯定了原碑記所頌揚的政績，也增強了此種評論的群體性。除了官員自己出示為其所立之碑，也有作者提供其所作碑記的情形，如楊維禎 (1296-1370) 讀到烏馬沙之德政記即是如此：「契世則以所著烏侯梅前州政績碑示余，中叙禦畚鍤一事尤詳。余未識烏侯，而世則之文可徵也。」<sup>18</sup> 楊維禎的評論重在烏馬沙守土的功績，從其最後「文士頌其績衆矣，而守土之義未有發焉，余故特發之」的感慨看來，他所讀到的不僅是「政績碑」本文，可能還包括其他文士的題跋詩文等，而整個徵求題跋的過程也許是由作者主持。這透露在地方刻石立碑之外，去思碑同時以文本的形式徵求其他士人的評論。「題跋」不限於文，也包括詩、贊等，類似贈別、頌揚詩卷的作法。如袁桷〈題李廷弼歸安去思碑〉便以

<sup>15</sup> 元·吳澄，《吳文正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7 冊），卷五五，〈題郝令德政碑後〉，頁 12 下-13 下。

<sup>16</sup> 元·徐明善，《芳谷集》（收入《豫章叢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6〕，集部第 7 冊），卷三，〈題跋·憲僉郝子明樂壽縣去思碑〉，頁 601。

<sup>17</sup> 郝鑑無墓銘碑誌等傳記資料留存，今所知其生平（字子明，廬龍人，由河間路獻州樂壽縣尹，遷南臺御史，再陞江西憲僉，後任湖州路總管）主要來自這兩篇題跋：程鉅夫 (1249-1318)，〈書郝子明贈行詩卷〉，《程鉅夫集》（收入《元代別集叢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卷二五，頁 319；以及牟應龍 (1247-1324)，〈湖州路總管郝中議生祠記〉，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遼金元石刻文獻全編（二）》（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 256-257。

<sup>18</sup> 元·楊維禎，《東維子文集》（收入《四部叢刊》第 245 冊），卷二一，〈書烏馬沙侯德政記後〉，頁 11 上。

詩的形式歌頌。<sup>19</sup> 另如朱德潤 (1294-1365) 文集中存有〈吳仲常太守德政碑贊〉，<sup>20</sup> 吳仲常即吳秉彝，楊維禎為作的〈平江路總管吳侯遺愛碑〉<sup>21</sup> 今仍存，以朱德潤居於平江路這點來看，其〈贊〉之作可能是當地士大夫共同參與去思碑製作的結果。換言之，有些去思碑之作從一開始就同時以立碑與文本兩種形式存在，碑存在於地方社會，文本則採用士人間傳播的模式。去思碑既有一開始的集體參與，也得以更廣泛地傳佈，例如，楊維禎便在不認識烏馬沙的情況下讀到其政績碑。

藉由題跋，去思碑的內容也可以繼續擴充。有些題跋補充個人的見聞，如虞集 (1272-1348) 〈書堂邑張令去思碑後〉，<sup>22</sup> 原碑為元明善〈縣尹張養浩去思碑〉，今尚可見。<sup>23</sup> 比較兩者，可以看到，虞集增加了許多資訊，其內容不啻另一德政碑。另如上述楊維禎的詮釋，則透過新的詮釋方式加強了烏馬沙政績的意義。或如吳澄、徐明善兩份題跋都同時稱許郝鑑任南臺御史、江西憲僉事的表現，通過題跋，此一德政碑的文本遂增加了原來樂壽縣尹之外其他任上的政績。這些補充，使去思碑傳達的訊息不停留在立碑的當下，而成為一份不斷「更新」的文件。

對個人而言，這些以文本形式存在的去思碑，遂成為一份關於他們生平的紀錄文件。在士人的往來中，去思碑可以用來介紹個人。例如，吳允請許有壬 (1287-1364) 為其父吳之文之堂作記時，即「以昔尹文安去思碑拜而請曰：翁歷履，此其槩也」，<sup>24</sup> 去思碑發揮類似履歷的作用。或如趙孟頫 (1254-1322) 在為晉寧路治中楊寶作先塋碑文前，「徵其行事，得參知政事王公思廉所撰侯為平定

<sup>19</sup>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六，頁 16 下-17 下。去思碑今不存，但黃潛為李拱辰 (1268-1324，字廷弼) 所作的墓誌銘也提到：「歷官三十年，家無留貲。治一府二縣，興利除害，靡有遺力。所至咸為樹碑，以紀遺愛。」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第 239-240 冊)，卷三一，〈奉議大夫御史臺都事李公墓誌銘〉，頁 16 下。

<sup>20</sup> 元·朱德潤，《存復齋文集》(收入《四部叢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84]，第 71 冊)，卷七，頁 3 上。

<sup>21</sup> 李修生，《全元文》第 42 冊，頁 274-276。

<sup>22</sup> 虞集，〈書堂邑張令去思碑後〉，元·蘇天爵編，《國朝文類》(收入《四部叢刊》第 329-331 冊)，卷三九，頁 7 下-9 上。

<sup>23</sup> 清·丘濬等修，《山東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39-541 冊)，卷三五之九，頁 43 下-47 上。傅斯年圖書館拓片編目號 01700。

<sup>24</sup> 元·許有壬，《至正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第 95 冊)，卷三九，〈一中堂記〉，頁 202。

知州時德政碑，言賣歷本，均課程，收皮革，興碾磑，省民錢五萬餘緡，他善政甚多。」<sup>25</sup> 德政碑的記載使其獲得趙孟頫的肯定，趙孟頫因而同意為之作先塋碑。再如蕭文孫，曾任臨江路總管府照磨，去職後，民立為政碑頌之。劉詵 (1268-1350) 不僅跋其「為政碑」，<sup>26</sup> 其後又作〈送蕭煥有入京〉一序，文中以蕭文孫得到去思碑肯定其表現：「為照磨臨江、興國，皆理冤澤物，戢暴婉貪，郡人為碑頌其政，以是稱為良材、為偉器，豈過論哉。」<sup>27</sup> 此序是在蕭赴京改選，經過臨江，士人餞送時所作。如此，蕭文孫的去思碑先是得到劉詵的題跋，繼而又成為劉詵贈序中稱揚其能力的證明。如果考慮到贈序作為社交憑藉的功能，<sup>28</sup> 此處去思碑以雙重方式作用：去思碑本身既是可題跋的社交文本，又成為其他交游文字的材料。

除了在生時當作介紹個人的資料，我們也常可看到去思碑成為去世後墓誌銘寫作的憑藉。例如，樂之昂知定陶縣，民為立去思碑，由李謙所作，其子樂仁後為翰林屬，請翰林學士程鉅夫為其父作傳，便用了此一去思碑。此碑今不見，但其內容卻轉化為其傳記的部份。<sup>29</sup> 同樣如虞集作董文用行狀，在敘述其衛輝路總管任上種種事蹟後總結：「為郡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郡教授陶師淵所撰碑文。」<sup>30</sup> 又如貢師泰 (1298-1362) 為劉輝 (1292-1352) 作墓誌銘，除了個人過去與傳主的私誼，也強調：「又得太常博士危君素所撰餘姚經界圖記、翰林應奉張君翥上海德政記，讀之，知君行事為甚信，因俊民之請銘，用不復辭。」<sup>31</sup> 黃潛 (1277-1357) 作〈中憲大夫淮東道宣尉副使致仕王公墓誌銘〉，也引「省臺薦牘

<sup>25</sup> 元·趙孟頫，《松雪齋集》（收入《四部叢刊》第 229 冊），卷八，〈蔚州楊氏先塋碑銘〉，頁 1。

<sup>26</sup> 元·劉詵，《桂隱先生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第 5 冊），卷四，〈書蕭煥有臨江為政碑後〉，頁 60。煥有為蕭文孫字。

<sup>27</sup> 劉詵，《桂隱先生集》卷二，頁 28。

<sup>28</sup> Chen, "Networks, Communities, and Identities," chap. 4.

<sup>29</sup> 《程鉅夫集》卷二五，〈樂之昂傳〉：「余故并采王、李二君所載而為之傳，以附忠孝之義焉。」（頁 334）

<sup>30</sup> 元·虞集著，王頌點校，《虞集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翰林學士承旨董公行狀〉，頁 855。

<sup>31</sup> 元·貢師泰，《玩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15 冊），卷一〇，〈奉訓大夫紹興路餘姚州知州劉君墓誌銘〉，頁 7 上。文中所言危素的〈餘姚州經界圖記〉（氏著，《危太樸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 7 冊〕，危太樸文續集，卷一，頁 3 上-4 下）仍存，張翥 (1287-1368) 的德政碑則部份保留在方志中（〈劉侯去思德政二碑〉，李修生，《全元文》第 48 冊，頁 603）。



及安陽韓先生、國子監丞陳君旅諸公所為善政記、惠政歌」，作為其「興利除害」政事表現的根據，而後來《元史·良吏傳》中關於墓主王艮（1278-1348）的記載，即全本於黃潛此篇墓誌銘。<sup>32</sup> 由上可見，包括德政記在內的碑記文字被小心地保存，作為個人的紀錄，最後並為誌銘行狀作者提供了傳主施政的內容，甚至被納入史傳。除了具體的資訊外，去思碑的存在本身即傳達了一種評價，既有來自「循吏傳統」的權威，也有作碑者個人提供的肯定，而這種評價則是在士人共同的文化中被理解。

上文顯示，去思碑不僅是樹立於地方社會的碑石，同時是流傳於士人網絡中的文本。對地方而言，去思碑是召喚過去的紀念碑；對個人而言，則是使用於當下的文本。去思碑作為文本，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其流傳形式展現的是元代士人文字往來中的「題跋模式」。我這裡所說的「題跋模式」是指在最初的文字成形後，不斷繼續尋求新的文字加入的方式。題跋在宋代大盛，學者注意到內容上的發展，<sup>33</sup> 而元代的「題跋模式」可以說是宋代題跋之風的延續，但不限於文體意義的題跋，而更是行為模式的題跋：亦即，無論一開始是個別的、有特定目的之記、傳、誌、贊等，或原本便是集體活動結果的詩卷、圖卷等，都通過各種連結、各種方式使更多人參與寫作。可以說，元代士人將「題跋」的群體性發揮得淋漓盡致。第二，在這個過程中，去思碑成為「社交文字」的一種。這些寫作不僅是思想的表達、感情的抒發，同時是社交往來的一部份。換言之，寫作活動不僅是創作層面的，並且是社會層面的。許多作品本來多少都因人際關係而作，都有些社交的成分，但此處特別點出「社交文字」，係因社交往來在此類寫作的動機、過程或應用上扮演關鍵的角色，其意義也在社交互動的網絡中產生。

## （二）其他頌揚政績的記文

當我們開始從「頌揚政績的文本／社交文字」這個角度去思考去思碑時，可以看到，元代去思碑之多固然是個突出的現象，但就頌揚地方官政績的行為而言，當時還有許多如「遺愛傳」、「德政序」、「善政詩卷」，甚或建築記文等同有頌揚之效，但可能另有主旨、或僅以文本存在的體裁。對官員個人來說，去

<sup>32</sup>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四，頁17上。文中所提陳旅所為善政記今尚存，見元·陳旅，《安雅堂集》（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匯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卷九，〈王經歷惠政記〉，頁4上-6上。

<sup>33</sup> 如朱迎平，〈宋代題跋文的勃興及其文化意蘊〉，《文學遺產》2000.4：84-93。

思碑與其他頌揚性的文字有共通之處。以下便先觀察一些刻石記文。

去思碑記載官員的善政，其內容不僅是對事蹟的「如實陳述」，更重在褒揚或感戴之情的表達。此一形式特徵讓我們注意到，其他的碑記文字有不少與去思碑風格類似。首先，當時有一些記載地方官個別行事的碑記，其內容形式與去思碑大體相同，唯不限於官員去任後整體的追思，而是當下對個別事蹟的頌揚。常見的有禱雨記，如吳澄〈撫州路達魯花赤禱雨記〉：「郡之父老咸曰：此郡四五十年以來，未見有郡侯如此憂民，如此敬神者，亦未見有祈雨得如此靈應者，我民咸願紀其實，以無忘侯之德。」<sup>34</sup> 禱雨碑記有兩種常見的寫法，一是標舉神功，一是表揚地方官之勤之誠，後者常以「禱雨感應」、「祈雨靈應」之類為名，以頌揚地方官為主。<sup>35</sup> 平反疑獄或治獄是另一個常見的主題，如吳澄〈江西等處行中書省照磨李侯平反疑獄之碑〉：「淦人撫侯平反事實為傳，又將勒諸石，余乃因其傳，次叙其辭而繫之以詩。」<sup>36</sup> 又如王禕（1322-1373）為貢師泰作的〈紹興讞獄記〉：「至正四年夏，宣城貢公由應奉翰林文字出為紹興總管府推官。……公在官四十三月，去之日，郡民家為位焚香以拜，父老攀留，填塞道路，馬不得前，追餞數十里，涕泣而別，囚之居囹圄者聞公去，亦皆慟哭不已。……公於紹興所讞獄事，其蹟之著者不可勝數，今姑存十一於千百，著之於篇，將使世之為吏者有所取則焉爾。他善政已具遺愛碑者，茲不復書。」<sup>37</sup> 在遺愛碑之外另作記文，是為了使後人取法。

其次，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建設記文被當作地方官的政績記，甚至從標題便表明褒揚地方官的目的。如朱鐔〈御史大夫康里公勉勵學校記〉，<sup>38</sup> 主要內容為紹興路儒學之修復，全文卻以南臺御史大夫慶童對學校的關切為主題，記名亦題為「勉勵學校記」，而非「修學記」之類。再如高明作〈麗水縣尹梁君政績記〉，著

<sup>34</sup> 吳澄，《吳文正集》卷三五，頁18上。

<sup>35</sup> 如衛元，〈湯廟禱雨感應之碑〉，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遼金元石刻文獻全編（一）》，頁502-503；趙恆，〈絳州同知虎公聖母廟禱雨靈應碑〉，《遼金元石刻文獻全編（一）》，頁596；張翼，〈梁公祈雨靈應記〉，清·恩端修，光緒《平遙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山西府縣志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第17冊），卷一一上，頁14上-17下。

<sup>36</sup> 吳澄，《吳文正集》卷五〇，頁18下。

<sup>37</sup> 元·王禕，《王忠文公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8冊），卷一一，頁28上-32上。

<sup>38</sup> 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遼金元石刻文獻全編（二）》，頁436-438。

重縣尹梁順修通濟堰之政績：

〔修通濟堰成〕民飽黍稻，相慶而歌曰：「堰之復，野乃沃。昔蔓草，今百穀。匪梁君，孰我育？」遂以白於部使者。部使者索公，深加賞諭。乃復立石渠上，以頌君績，且像而祠之。則又相謂以為君之善政，固不只是。矧復堰之功，雖野夫堯子皆能稱頌，而達官顯人或未之知，盍紀君績于通衢大邑，以彰厥德，俾為祿仕者咸知攸勸，乃復請予書。<sup>39</sup>

由文中記載可見，百姓已向部使者表彰縣尹之功，並於堰上刻記、立生祠，仍覺不足彰顯，又另立政績記於通衢，使來往的達官貴人可見。因此其重心不在記錄建設（「修通濟堰記」），而在褒揚地方官（「政績記」），雖為特殊一事之記，卻以「政績記」之類的通稱為題。另如黃潛〈麗水縣善政記〉<sup>40</sup>亦是專門針對減鹽引一事，而標以「善政記」。

再次，有些建設記文即使不在題目中標出政績，細讀其內容，亦可見其作為「政績記」的表揚性質。例如胡祇通（1227-1295）〈新開天平水記〉<sup>41</sup>記知林州李漢卿導天平之水，解決長久以來缺水的問題，記文之作，是「闔境之人以公有潤物之功，而感公之仁，能見前後臨民者之所未見，而嘉公之智，刻石記事」，胡祇通的議論亦強調「順民之所好，去民之所惡」的「子民之道」，全文重在褒揚知州之功，不啻一篇德政碑記。再如汪克寬（1304-1372）〈邑東平政橋記〉記祁門縣平政橋之修復，主於縣尹余寶修橋之功：「余惟余侯之為政知要，而濟物之功甚博，德之及人，蓋倍蓰於編竹橋而渡蟻者，於法宜書。」<sup>42</sup>又如王思廉（1238-1320）〈重修元氏縣學記〉，文中提到「三宜書」，皆是闡揚董繼昇修學的功績，其中第三點：「遠而田、鄭、裴、曹（宋代建學、修學者），近而張、王、平、董（元初修學者），咸列貞石，昭示永久。如君者，獨使之湮鬱不章，可乎？……若夫前代泊我朝崇儒重道之意，與夫勉勵士子為學進德之方，二碑載之已詳，可得而略也。」<sup>43</sup>國家對興學的提倡或生徒求學的方向，正是一般學記的主題，此記則闕而不載，其理由是前兩篇學記已經詳述。因此，此記之作，完

<sup>39</sup> 李修生，《全元文》第51冊，頁98。

<sup>40</sup>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一五，頁1。

<sup>41</sup> 元·胡祇通，《紫山大全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6冊），卷九，頁27下-29下。

<sup>42</sup> 元·汪克寬，《環谷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0冊），卷五，頁12下-15上。

<sup>43</sup> 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遼金元石刻文獻全編（三）》，頁276-280。

全是為了褒揚縣尹董繼昇，<sup>44</sup> 不使其功湮滅。「記」體本以記事為主，但這些建設記文中，原本只是「備不忘」而列名的主事者，<sup>45</sup> 卻可能轉為記文的主角，褒揚地方官的目的勝過對建設緣由、過程的紀錄。

此外，還有如〈承恩堂記〉般直接表明以建築記取代去思碑的情形。據此文所言，吳密任渤海縣尹，由於政績稱最，得到朝廷金緞之賜以為獎勵，吳密因而扁其官署之堂為「承恩」，以昭其賜。吳密鄉人先許有壬為題「承恩」二字，許另作〈承恩堂記〉，則是應渤海縣民之請。由於吳密當時還在任，依規定「諸職官居見任，雖有善政，不許立碑」，<sup>46</sup> 縣民又不願等到吳密去任再立去思碑追思，因藉皇帝之賜，以〈承恩堂記〉代德政碑，褒揚吳密的政績。<sup>47</sup> 此例顯示，「見任官不應立碑」的規定顯然是被認知且遵守的，但除了去思碑外，仍有別的方式可以表彰地方官的政績，〈承恩堂記〉就是一個例子。文中並提及，除了〈承恩堂記〉，當地又有「德政詩」百首，敘述吳密百件政績，亦為另一種表彰方式。

至如「瑞麥記」之類，藉祥瑞之生褒揚地方官之政績者，亦不少見。如陶安(1315-1371)所作〈瑞麥記〉：「河南靳侯處宜守太平之明年為至正癸巳(1353)，瑞麥產於城北，一莖兩岐，郊民持獻侯廷。」接著敘述靳義抵禦亂事、保護地方的功績，從而有產生瑞麥的安定環境。最後提到：「僚屬請奏休祥，侯隱抑不居其美，士民皆謂曰：……苟不著其實，非所以彰景貺，報惠政也。求記于余。」<sup>48</sup> 瑞麥嘉禾本是上呈於君主的祥瑞，<sup>49</sup> 在元代卻轉為以褒揚地方官為

<sup>44</sup> 董繼昇任平陰縣尹時有去思碑，李之紹(1254-1326)〈縣尹從事董君去思頌〉，李修生，《全元文》第20冊，頁87。

<sup>45</sup> 明·吳訥，〈文章辨體序題·記〉：「金石例云，記者，記事之文也。……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如記營建，當記月日之久近，工費之多少，主佐之姓名，敘事之後，畧作議論以結之，此為正體。」（明·程敏政編，《明文衡》〔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73-1374冊〕，卷五六，〈雜著〉，頁17下-18下）

<sup>46</sup> 明·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一〇五，〈刑法志·禁令〉，頁2682。

<sup>47</sup> 許有壬，《至正集》卷四三，〈承恩堂記〉，頁223-224。文中提到許有壬在其赴任時曾作序送之，即〈送吳安之赴渤海縣尹序〉，序中勉勵吳密成為良令，「余雖不與考績，尚能為子紀其實」（《至正集》卷三五，頁183），顯示士人自覺地在朝廷制度外以文字表彰的權威。而〈承恩堂記〉即是此一承諾的實踐：「有壬昔之序有曰：余雖不與考績，尚能為子紀其實。密也在邑不二年，治效有成，紀實踐言，記其可辭？」（頁224）

<sup>48</sup> 明·陶安，《陶學士先生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7冊），卷一七，〈瑞麥記〉，頁18上。

<sup>49</sup> 如元·陸文圭(1252-1336)《牆東類稿》（收入《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

主，也在誌銘傳記中作為政績證明，<sup>50</sup> 亦是當時頌揚政績風氣盛行的一個表現。

無論文體原本的性質為何，這些各式各樣實質上意在褒揚的內容一方面透露了當時的風氣，而更重要的是，它們的褒揚意義是在士人的應用中展現的。就官員而言，這些記都是他們在任時逐項政績的證明。如季仁壽 (1302-1362)〈達魯花赤買住公善政碑〉<sup>51</sup> 中首先提到的築堰堤、復學田、減鹽額三事，「昔載于石，皆可徵已」，都分別有記文，去思碑之作援引這些記文為證，而即使沒有綜述政績的去思碑，這些個別記文也都可以被官員用為己身治績的紀錄。墓誌銘中也常可看到引用這類記文。如楊伯循 (1291-1343)：「除曹州成武縣主簿，官進義校尉，有惠政，邑人紀之碑。終更，人不能忘，又為去思碑。」<sup>52</sup> 又如前引趙孟頫〈蔚州楊氏先塋碑銘〉之作：「又得榆關岳蕃及同知武州事楊述所為碑文，言侯引龍池以給安平溝，卻湫以通亂柳，導盤纏河以貫裴村，凡水之利無遺力焉。而侯不憚胼手胝足，躬事畚鍤，以為民倡。故雖功大力鉅，而成不踰時，古所謂西門豹鄭國之流殆無以過之。」此碑文應是某種水利建設碑記，被用為楊贊勤於治理的表現。這些建設記文同樣不僅是樹立在地方的碑石，也是官員個人成就的紀錄。它們的意義同樣通過題跋模式產生、加強，如黃潛為蘇天爵 (1294-1352) 所作的長篇〈治獄記〉，又有吳師道 (1283-1344)、許有壬、劉基 (1311-1375)、趙汸 (1319-1369) 諸人分別題跋，今存於各人文集中。<sup>53</sup>

司，1989〕，第 133 冊），卷五，〈瑞麥圖序〉提到大德元年得麥「一莖三穗」而歸功於當年皇帝發佈之德音：「圖以詩之，侈張其事，請聞于上。……夫年之豐凶，雖係乎天，亦係乎政之得失。政自上而下者也，善政致祥，茲其驗矣。守土臣不敢自以為功，謹摭民謠，列之篇次，自附于唐叔得禾之義，以顯揚國家之休命。」（頁 3）

<sup>50</sup> 如元·姚燧 (1238-1313) 作李德輝行狀，便提到：「嘉禾瑞麥，六出其境」（氏著，《姚燧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卷三〇，〈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頁 460。宋濂作汪澤民神道碑，提到他知兗州，「嘉禾生於縣郊，瑞麥孕於洸水，君子謂有漢循吏之風焉」（氏著，《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元故嘉義大夫禮部尚書致仕贈資善大夫江潮等處行中書左丞上護軍追封譙國郡公諡文節汪先生神道碑銘〉，頁 380）

<sup>51</sup> 李修生，《全元文》第 47 冊，頁 32。

<sup>52</sup> 許有壬，《至正集》卷五八，〈故西華縣尹楊君墓志銘〉，頁 297。

<sup>53</sup>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一五，〈蘇御史治獄記〉，頁 1 下-4 下；元·吳師道，《吳師道集》（收入《元朝別集珍本叢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卷一八，〈題跋·蘇御史治獄記〉，頁 434；許有壬，《至正集》卷七二，〈題蘇伯修治獄記〉，頁 267-368；元·趙汸，〈讀黃侍講所撰御史蘇公治獄記後〉，李修生，《全元文》第 48 冊，頁 406-407；明·劉基，《誠意伯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5 冊），卷七，〈書蘇伯修御史斷獄記後〉，頁 38 下-40 上。

干文傳 (1276-1353) 所作的〈休寧縣瞻儀堂記〉則透露了這些建設記文背後的社會意涵。瞻儀堂實為縣尹唐棣 (1287-1355) 之生祠，干文傳在記中引虞集為其修學、危素 (1303-1372) 和范匯為其均賦役一事，以及黃潛為其修門樓所作之記，<sup>54</sup>「是數公者，當今能立言之士，不妄許可，而皆極口稱道其美。吁！唐君所得與於諸公者，亦必有道矣。由是庶民得安於田里，行旅歌謠於道塗，為士者鼓舞於縣庠，固其宜也。」<sup>55</sup> 可以看到，這些記文不僅記錄了唐棣的政績，同時也建立了作者與唐棣的聯繫，從而成為唐棣能力的證明。這樣的論證方式，最能顯示這類文字背後的社會網絡意義。值得注意的是，虞集的修學記和黃潛的新門樓記雖皆褒美唐棣成事之功，但並未以之為主，屬於傳統記文的作法。但透過干文傳的詮釋，它們仍可發揮「社交文字」的功能，顯示文字間引用時意義的添加與轉換。<sup>56</sup>

上述可見，記載官員政績的方式有很多：除了離任時綜論政績的去思碑，在任時的種種建設碑記，也常以百姓表揚的形式寫作。對官員個人而言，它們都是重要的紀錄。這些碑記原意在記錄過程，轉而突出其中官員功績一項，也多少透露當時注重頌揚的風氣。更重要的是，它們被運用的方式、它們在士人網絡間流動、增生的意義，是這些紀錄具有社會文化價值的關鍵。

## 二・士人的頌揚詩卷

除了碑記通過「題跋模式」而轉化為「社交文字」外，另有原本就是從社交活動產生的形式——詩卷。

### (一) 餞別詩序

去思碑往往宣稱反映地方「士民」之意，是地方整體情感的表達。但除了

---

<sup>54</sup> 其中數篇今尚存，《虞集全集》，〈休寧縣建學記〉，頁 786-787；危素，〈休寧縣尹唐君覈田記 丙戌〉（下文另有討論），范匯之文今不見；黃潛，〈休寧縣新門樓記〉，清·何應松，道光《休寧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第 627 號），卷二一，頁 17 上-18 上。

<sup>55</sup> 李修生，《全元文》第 32 冊，頁 85。

<sup>56</sup> 唐棣是元代知名的畫家，其仕途即以畫技進身，交游頗廣，參石守謙，〈有關唐棣 (1287-1355) 及元代李郭風格發展之若干問題〉一文。

代表地方整體的去思碑外，在官員去任之時，更常見的是來自士人階層的餞行文字。

在離別之時，士人群聚，作詩賦別，並為序繫於詩卷之前，或單獨以序相贈，唐宋以來，日益普遍，至元尤盛。而在元代的送行場合中，餞別去任官員的詩（或於聚會時賦詩，<sup>57</sup> 或有人出面組織邀詩<sup>58</sup>）、序（通常附在詩卷之前，但亦有不少為單獨的贈序）<sup>59</sup> 成為突出的一類，透露出當時地方官與地方士人的來往關係。而這類的〈秩滿序〉、〈離任序〉常會提及其政績，<sup>60</sup> 就作為褒揚個人的文本而言，與去思碑有類似的作用。例如黃潛的〈送周明府詩序〉：

侯書滿解印綬，行有日，吾黨之士各賦詩以道其戀慕之私，俾潛序于篇首。……輒因序詩而附見侯行事之大略，俟他日傳循吏者采擇焉。<sup>61</sup>

黃潛在這篇送行序中，敘述了周縣尹的種種政績，並提到「所居民富，所去見思，至於生為立祠樹碑」的民情反應，以及他「治行為諸邑最，憲府方交章列薦於中朝」的官方肯定，而賦詩則是表達地方士人的「戀慕之私」。這篇序文讓我們看到代表百姓、官方和士人等不同群體肯定政績的方式，也展現「序」在眾詩之前「敘述」事蹟的重要功能（「因序詩而附見侯行事之大略」）。

<sup>57</sup> 如程端禮，《畏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9 冊），卷四，〈送自怡公序〉：「餘干監州台巴哈哈公行有日，浙東帥閻長貳僚屬、郡縣守令與凡交游之士集送，為歌詩以餞，程端禮舉酒為壽言曰：……。」（頁 14 下）

<sup>58</sup> 如元·李存，《鄱陽仲公李先生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92 冊），卷一六，〈贈貴溪縣梁尹序〉：「梁公天泉來尹信之貴溪縣且六年，……今且去也，而何君時叔者，邑之佳士人也，倡為詩歌以惜美之，而徵序言於余。」（頁 3 上）或如袁楠，《清容居士集》卷二三，〈送蔡府尹歸里序〉（頁 22 下-23 下）本身即是為號召士人「為歌詩以餞」而先作。

<sup>59</sup> 如《劉將孫集》（收入《元代別集叢刊》），卷一二，〈贈河間王侯序〉：「感頌侯之德者，願有以記之，予敘其實，不溢辭，以為紀實者所以傳信。」（頁 105）又如烏斯道（1314-1390），《春草齋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138 冊），卷八，〈贈慶元監郡元臣侯德政序〉因友人之請而作：「敢求文於子，以旌吾感侯之德也。」（頁 6 下）

<sup>60</sup> 與仕宦相關的贈序、送別序中有兩種常見的場合，一是送某人之官序，另一則是送某人離任序。前者著重於將赴任之官之地的特性，後者則是強調其在前任的作為。如元·舒頔，《貞素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17 冊），卷二，〈送旌德縣達嚕噶齊赫斯公秩滿序〉，頁 16 下-18 上；又如元·趙汭，《東山存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1 冊），卷三，〈送休寧監邑坊侯秩滿序〉，頁 1 上-5 上。

<sup>61</sup>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一八，頁 2 下-3 下。黃潛指出，他在此序中記載周縣尹的政績，是為了提供將來〈循吏傳〉的史料。這是一種用以恭維的修辭方式，但也解釋了作者刻意在文中留下政績的作法。

程端禮 (1271-1345) 的文集提供我們一個觀察的例子。程端禮是慶元路的知名學者，由其師史蒙卿 (1247-1306) 上接朱熹一脈，以編輯《讀書分年日程》一書知名後世，一生仕宦則為南人由學官入仕的典型。<sup>62</sup> 程端禮作多篇秩滿序，主要即以地方名士與學官這兩種身分。其《畏齋集》中有三十三篇與送行有關的序，其中十八篇是給離任官員的序（其餘十五篇中，五篇送赴任，七篇送生徒，三篇送僧道），且除了兩篇未明確提及外，<sup>63</sup> 其餘十六篇皆是為地方士人集體「歌詩以餞」之詩卷作序。十八篇中，十二篇與慶元路相關（包括慶元路下個別的縣、慶元路整體，或以慶元路為基底的「浙」或「浙東」——慶元路在元代同時是浙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等一些其他行政機構的所在地），程端禮的角色是鄉里名士；另外六篇則是程端禮分別在廣德之建平縣儒學教諭、建康江東書院山長，以及鉛山州教授任上所作，顯示學官在地方詩文活動中的角色。序文之外，程端禮另有僅以賦詩送行之作，如〈奉題袁御史餞行詩卷〉。<sup>64</sup> 這也提醒我們，雖然留存的可能只是個別名士的序文，每一詩卷序背後其實還有一群共同參與的士人。

《趙氏鐵網珊瑚》中存有〈良常張氏遺卷〉，<sup>65</sup> 收錄元後期士人張經在不同場合得到的各種士人文字，其中包含張經由吳縣尹陞任嘉定州同知時，鄭元祐所作〈送張吳縣之官嘉定分題詩序〉，述及張經在戰亂後安定地方的惠政，其後則為諸士分題賦詠之詩。鄭元祐文集中與張經書亦提及：「朋友間以詩、以序，其所以頌遺愛，揚令名，播德馨，可謂充盡老筆也已，早晚鑱諸石。」<sup>66</sup> 另有一首

<sup>62</sup>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三三，〈將仕佐郎台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程先生墓誌銘〉，頁 9 下-12 上。

<sup>63</sup> 一篇是〈送鉛山州判官吳大任代歸序〉，文中雖未特別提及士人群體賦詩，但述及「州人之德大任尤深，今其行也，祖帳滿道，耄倪攀戀，至不能別」（程端禮，《畏齋集》卷三，頁 29 上）的餞行活動；另一篇是〈送宋鉉翁詩序〉（卷四，頁 22）。程端禮另有〈題宋鉉翁詩卷〉（卷一，頁 9 下-10 上）一詩，內容呼應其序所載政績，則當有一詩卷。又程端禮，〈壽判官吳大任二首（十一月二日）〉（卷二，頁 8）一詩顯示地方士人與官僚的來往，而離任餞別詩序則是此一往來的結果。

<sup>64</sup> 程端禮，《畏齋集》卷二，頁 13 下。

<sup>65</sup> 明·趙琦美，《趙氏鐵網珊瑚》（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5 冊），卷八，頁 27 下-60 下。清·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收入《叢書集成初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第 1 冊），卷四載有：「送張吳縣之官嘉定詩一卷，送張府判詩一卷，良常草堂詩一卷」，都包含在〈良常張氏遺卷〉中。

<sup>66</sup> 鄭元祐，《僑吳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95 冊），卷七，〈書·與張德常（二首）〉，頁 15 上。此書第一首提到：「僕贊郡無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據以推測可能為鄭元祐代他人作，不過不影響其提及友朋贈行詩卷一事。



題為〈吳縣鄉三老顧子明求送前縣尹張君德常改除嘉定州同知詩，西澗老樵賦此為贈〉，由地方耆老出面另行邀詩，是一開始分題賦詩活動之後，有人組織繼續題詩的表現。其詩即歌詠張經「亂離安輯撫瘡痍」之功，末二句為「三老手編遺愛傳，送行當就去思碑」。我們今日所見多是留存於各文集中單篇的序或詩，此例可以讓我們略窺這種送行詩卷的形態。

就內容而言，一般來說，〈秩滿序〉、〈離任序〉不若去思碑詳盡，<sup>67</sup>特別是在同時有碑與序的情況。如陶安〈送程推官序〉中稍稍述及其任太平路推官理刑獄的事蹟，但最後則說：「既代，士類為詩送別，俾予序之。若其政績之詳，載在去思之碑，茲故不述。」<sup>68</sup>自覺地區別贈序與去思碑的作用。程燧的去思碑今不存，但其他目前碑與序俱存的例子，也確實可以看出此一差別。例如，石光著在嘉興縣尹任滿後，張世昌應邑士之請，作〈石縣尹善政碑〉細述其政績，<sup>69</sup>而貝瓊（1297?-1349）作〈送石仲明序〉，<sup>70</sup>對其離任嘉興後改知崑山州，則泛敘嘉興士民之悵與崑山士民之喜。即使是同一作者，由於文體不同，語氣也不同。如胡祇通同時為彰德路達魯花赤完閭作去思碑和送行序，前者是「邦人懷慕不已，礪石狀績，乞言于不肖頌公之德美，歌詠于無窮，以厚薄俗，以勸來者」，細述其政績；後者則是「多士」之頌，重在完閭讓位其叔的經過，頌的部份才是「因邦人以遺愛去思之情而為之頌」，也僅是比較泛泛的稱頌，而非具體的事蹟。<sup>71</sup>這透露了兩者文體／文類性質的差異。但如果放在一起看，兩者的共通性在於都有頌揚之效，呈現出一個整體的「頌揚文化」。

如上所述，在大多數的場合，餞別詩、序是士人間的活動。如果說去思、遺愛碑代表整個地方的心意，送行的詩卷則可說是以士大夫為主。但也有些〈秩滿序〉仍然訴諸地方父老的意願，如蔣易〈送阮左丞移鎮泉南序〉，文章主要敘述「耆老士民」請留之言以及離任官員對耆老士民的勉勵之語，最後，「於是耆老士

<sup>67</sup> 雖然亦有敘述政績詳盡，如去思碑者，如陸文圭，《牆東類稿》卷六，〈送喬州尹序〉：「歸有日，士歌詩以餞之，余叙其梗概焉。古之為序者，叙其所以然，弗著美也。著之，所以勸後也。侯之美多矣，大者恤民養士，餘弗著，畧之也。畧之，侯志也。……今州縣之牧民者不及侯多矣，此序所以有感而作也。」（頁5下）

<sup>68</sup> 陶安，《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一四，頁21下。

<sup>69</sup> 張世昌，〈石縣尹善政碑〉，李修生，《全元文》第58冊，頁183。

<sup>70</sup> 明·貝瓊，《清江貝先生集》（收入《四部叢刊》第250冊），卷八，頁1。

<sup>71</sup> 胡祇通，《紫山大全集》卷一五，〈懷遠大將軍彰德路達魯花赤燕只吉台公德政去思碑〉，頁1下-2上；卷八，〈送監司之濟南序〉，頁43下。

民既不能留，……既久，相與咨嗟永嘆，發聲成文，庶不忘公之德。」<sup>72</sup> 這類〈秩滿序〉內容亦與善政記、德政碑相似，如楊維禎的〈送平江路推官馮君序〉，開頭便言：「平江路推官許下馮君秩滿，蘇父老留不可，則相與述為歌謠以送之，求予言登載其所善，以為之序。予客蘇未久，不識其所善，詢之父老，則曰：……」<sup>73</sup> 以下則敘述父老所言之政績。這是德政碑常見的寫法之一。此序不僅應父老之請而作，且父老明白要求在序中記其善政。<sup>74</sup> 有些則直接以「政績詩序」、「遺愛詩序」為名，<sup>75</sup> 如陳基 (1314-1370) 〈崔衢州政績詩序〉：「邑父兄既刻石紀侯勳績，復相謂曰：……侯之德非石不傳，蓋詩所以美盛德、歌休功而告來裔也。……今衢有賢侯，誠宜璽書褒獎，增秩賜金，以風天下，乃嗟嘆不足而詠歌之，其亦有待於觀風之使乎？」<sup>76</sup> 既立石，復作詩頌之，並暗示這些歌詠有傳達訊息與監察官員，以助地方官獲得皇帝獎勵之意。陳基另一篇〈馬千戶遺愛詩序〉：

松陵於和仲來致崇德父兄之言曰：前鎮守邳州萬戶府左翼千戶馬侯有德於吾州，其去也，樹豐碑，記遺愛，而嗟嘆之不足，又形於歌詩。蓋公好惡，詩人之情也，願為之序。<sup>77</sup>

從文中看來，當地已為之立遺愛碑，仍不足以盡其頌揚之意，又作詩歌稱美。這

<sup>72</sup> 李修生，《全元文》，頁 92-93；又如元·戴良，《戴良集》（收入《元代別集叢刊》），卷五，〈甘棠集序〉：「北庭廉侯來長嫠之浦江，浦江之民咸愛戴之如父母，畏敬之如神明，倚賴之如山岳。三年政成，治任將歸，而黃童白叟涕泣以遮留者動千百計。已而侯之去志浩不可挽，又皆退而悲思，商賈相與歎於市，行旅相與歎於塗，耕農相與歎於野。低徊顧盼，不知所圖，則推夫吾黨之工乎詩者作為聲詩，以詠歌之。」（頁 56）

<sup>73</sup> 楊維禎，《東維子文集》卷四，頁 10 下。

<sup>74</sup> 並不是所有的贈序都是這種寫法。如楊維禎〈送理問所知事馬公序〉（氏著，《東維子文集》卷四，頁 11 下-12 上）之類，便不是這種應民之請「去思碑式」的寫法，而是從楊維禎個人觀點來陳述。事實上，這種寫法是少數，或許反映了去思碑的影響。相對地，如林泉生 (1299-1361) 〈送盧公調寧德任碑文〉（李修生，《全元文》第 46 冊，頁 72-74），乃「邑父母……求文亦紀去思」的碑文，卻是用「送……調任」的序題，則似乎顯示贈序類文體的影響。

<sup>75</sup> 元·陳基，〈李僉事政績序〉（氏著，《陳基集》〔收入《元代別集叢刊》〕，卷一七，頁 158）與鄭元祐〈贈李憲僉序〉（氏著，《僑吳集》卷八，頁 12 上-13 上）同樣都是李朵只建蘇州城之功，一稱〈政績序〉一為〈贈序〉，透露這兩種名稱實質上並無大異。

<sup>76</sup> 《陳基集》卷一七，頁 159。

<sup>77</sup> 《陳基集》卷一五，頁 144。

是常見的組合。<sup>78</sup> 在這類作品中，士大夫是作為地方百姓的代言者。

序放在為送行而作的頌揚詩卷前，從一開始就是為了致贈去任官員，讓他們帶走，與原意為留在地方、傳達去思的碑不同。如劉將孫 (1257-?) 作〈送樊仲璋序〉：「邦之人士又載之歌詠，且治卷屬敘，以傳南北。」<sup>79</sup> 即為了廣傳各地。又如陳基〈李僉事政績序〉：「乃論次公政績，為之序，以慰吳人之意，以傳之四方，以侈公之惠，而樂為天下道也。」<sup>80</sup> 楊翮〈贈明道書院權山長湯子逸序〉：「子逸畢志篤意，有功于學官甚著，士大夫蒙其實而軼其聞，非所以表賢能，厲功伐也，其如嗣子逸為之者何勸？謹書其事，藏之學官，歸其副子逸，為士大夫報。」<sup>81</sup> 因此無論是父老囑託或士人自動，其主要目的是使政績傳佈四方。

## (二) 個別政績的詩卷

以詩卷歌頌地方官，除了送行的場合外，也可能於地方官在任時即作。如俞鎮〈盧侯德政詩序〉，文中詳細地敘述盧侯的政績，如同德政碑，最後作者說明自己因守喪之故，「故不頌而采其出於學校縉紳之林者，為敘列之，以供觀人風者采焉」。<sup>82</sup> 以下列勸粟、禱晴、修社、理鹽、馭吏近民、簡訟恤刑、崇儒興學諸項。這當是一個大規模的詩卷。這類「詩卷」、「贈序」常是因特殊事蹟而作，如同上一小節提到的記文之作，並不像去思碑受去任方得立的限制。事實上，在當時的頌揚模式中，記文與詩卷並出的情形屢見不鮮。如上文提到休寧縣令唐棣，整理多年未清的稅籍，以均賦役，危素作有〈休寧縣尹唐君覈田

<sup>78</sup> 程端禮，《畏齋集》卷四，〈送王副使序〉：「至元三年 (1337) 春，中順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僉元帥府事鄆城王公 (王猷) 得代且行，七路士民依戀攀卧，如去父母。既為詩頌公之美，又兼屬筆於廬江況君肩吾立去思之碑。」(頁 8 下-9 下)

<sup>79</sup> 《劉將孫集》卷一四，頁 118。

<sup>80</sup> 《陳基集》卷一七，頁 158。

<sup>81</sup> 元·楊翮，《佩玉齋類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0 冊)，卷五，頁 8 上。

<sup>82</sup> 李修生，《全元文》第 37 冊，頁 12。文中未提及盧侯的名字，不過作者俞鎮是崇德州人，而許有壬，〈盧仲禮知崇德州未月而頌聲作題其卷末〉：「報政曾聞五月程，君侯旬日便蜚聲，良心感觸無愚哲，荒歲施為繫死生。才器每於難處見，詩書真到用時明，從今早備如椽筆，擬待三年頌有成。」(氏著，《至正集》卷一五，頁 80) 其中「良心感觸無愚哲，荒歲施為繫死生」二句正符合盧侯初至時正值旱荒，勸富家十五人賑濟鄉里的事蹟，也許是此詩卷中的一篇，保留在作者個人的文集中。

記》，<sup>83</sup> 士民另作詩卷稱頌，汪克寬為序：「簿書朦朧既久，一旦櫛剔絲分，如揭皦日，闔邑士民舉欣欣色喜，歌謠頌嘉惠，屬余書卷顛。余唯賢侯為政超越前令尹倍蓰千萬，其繼自今，賦役唯均，政恬事簡，考書上最，不辜朝廷掄材治郡縣美意，是宜述梗槩，庶幾部使者觀風有所考徵，且俾來者激勸，又以洩邑士民拳拳弗忘之心，廼書為序。」<sup>84</sup> 除了表達士民感恩之情，也明白指出有提供監察官員參考，以助縣尹仕途的目的。

上文提到記文常見的〈禱雨（靈驗）記〉或〈平反（冤獄）記〉兩種主題，也同樣有許多詩卷，如程端禮的〈喜雨詩卷序〉：

至正元年（1341）四月不雨，……四明郡守王公宿齋戒，躬率僚屬致禱於神，即日昭格，陰雲四合，雷雨大作，槁苗勃興。郡人歌舞，咸曰：有秋之望，由公之賜。又曰：公之蒞政，方六越月，以公廉為本而懷愷弟之政。春仲時勸農，首興水利，嚴瀦泄之備，先是，颶風歲饑，公既為萬民請濟，即捐俸勸分續食。凡為民利，知無不為。是所謂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者矣，宜其有禱即應，捷於桴鼓也。……學校之士為歌詩以志喜。<sup>85</sup>

由得雨而頌地方官之政績，認為其祈神得應是其善政的結果。王侯是慶元路總管王元恭，其四明之政另有去思碑。<sup>86</sup> 又如戴良作的〈禱雨詩序〉：「民愈喜，咸退而為喜雨之詩，以歸德於公。」<sup>87</sup> 平反冤獄之詩卷如楊維禎〈監憲決獄詩序〉：「余讀杭拔官朱蓮峰君誌監憲公平反冤獄事，為之慨嘆不已。……杭大夫

<sup>83</sup> 此文提到：「民情大悅，歌詠載道，於是父老請伐石紀其事，使至上京，求予為之文。」（危素，《危太樸集·危太樸文集》卷二，頁9下）另楊翮，〈唐縣尹生祠記〉，為縣中五城鎮黃氏宗族所建生祠，其中又提到「邑民既比比為侯作祠祠之，在學宮、僧寺及民居之里者，間刻石於祠，明所以載侯之義。」（氏著，《佩玉齋類稿》卷二，頁17上）這些祠看來也都是在唐棟去任前便建的。詩卷、記、生祠，可以看到去思碑之外表達感謝的各種形式。類似之例如湘鄉州知州王文彪（1278-1353）：「力辭而歸，民庶攀留填塞道路號泣而別，相率立公生祠三十餘所，又編大夫士所頌歌，鏤于梓，為甘棠集，列人民所慕思，鐫于石，為遺愛碑。」（王禕，《王忠文公文集》卷二二，〈元中憲大夫僉庸田司事致仕王公行狀〉，頁33下）亦是遺愛碑、生祠、甘棠集各種形式的感念兼具。

<sup>84</sup> 汪克寬，《環谷集》卷四，〈唐縣尹改政稅籍詩卷序〉，頁17下-18上。

<sup>85</sup> 程端禮，《畏齋集》卷三，〈喜雨詩卷序〉，頁4上-5上。關於此次祈雨得應，程端禮另有〈送道士齋齋呂君序〉（卷四，頁23下-25上），褒揚呂姓道士在祈雨過程中的功勞，但〈喜雨詩卷序〉則全歸功於州守。

<sup>86</sup> 朱元剛，〈慶元路總管正議王侯去思碑并序〉，傅斯年圖書館拓片 04694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1b/f7/0d.html>)。

<sup>87</sup> 《戴良集》卷六，〈禱雨詩序〉，頁61。

士咸作歌詩以美之，而推予為叙首，予樂為之書。」<sup>88</sup> 又如陳基〈趙泰州平反冤獄詩序〉：

至正十年二月，泰州尹真定趙公子威平反王昉冤獄，事聞，中吳士大夫皆曰：偉哉！趙使君真長者也。因相率著為聲詩以美之，總凡若干首。……於是相賀曰：趙使君一治泰州，而法為之平。使天下皆如趙使君，則人有冤死者乎？……然則詠歌之發乎情者，其可已乎？<sup>89</sup>

此詩卷雖不存，諸文集中尚保存一兩首題詩，如成廷珪〈題泰州趙子威太守平反王昉冤獄之事，是時趙子威適除翰林待制〉。<sup>90</sup> 此事另有鄭元祐（1292-1364）作〈趙州守平反冤獄記〉，以及王禕對此記的題詞。<sup>91</sup> 從目前散見各文集的詩文可見，趙儼與當時文人交游頻仍，此亦反映詩卷與士人社交的關係。元後期，戰亂蜂起，「平寇」開始成為常見的主題。例如邁里古思平定一三五七年婺州地區的亂事，婺地士人以詩頌揚：

然則公之有勳於吾邦者甚大，欲貺之以犧牲，則犧牲公之所自有也；欲投之以玉帛，則玉帛非公之所好也，其將何以為公之報哉？夫鋪張盛美，播之方今而傳於後世者，莫如詩歌，吾黨之士盍留意乎？衆皆曰然。於是陳樵先生倡之，邦人士咸作之，而命金華宋濂序之。<sup>92</sup>

說明士人認知到頌揚詩文以留名後世的功能，而以之作為報德的方式。<sup>93</sup>

即使是一般建設，也開始在記文之外又有詩卷歌詠，如鄞縣縣尉周一夔（字以韶）建縣尉廳，除了袁桷〈新建鄞縣尉廳記〉，<sup>94</sup> 程端學（1278-1334）作〈周以韶建縣尉廳詩序〉：「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袁公刻石紀績，大夫士歌詠其事，余

<sup>88</sup> 楊維禎，《東維子文集》卷一，頁10上。

<sup>89</sup> 《陳基集》卷一四，頁133。陳基文集中另有〈烏夜啼引〉一詩，序云：「聞人玉〔王〕昉為淮東元帥府奏差，被誣繫獄，部使者使泰州尹趙子威鞠之，平反其冤。」（卷六，頁49）當亦為此而作。

<sup>90</sup> 元·成廷珪，《居竹軒詩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6冊），卷二，頁24下。

<sup>91</sup> 鄭元祐，《僑吳集》卷九，頁22下-24下；王禕，《王忠文公文集》卷一七，〈書趙泰州平反記後〉，頁5下-6上。

<sup>92</sup> 《宋濂全集》，〈贈行軍鎮撫邁里古思平寇詩序〉，頁1983。

<sup>93</sup> 記文亦多，如陶安，《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一七，〈監郡珊竹元振招安記〉（頁12下-14上）；〈太平路同知仲禮功績記〉（頁14上-15下）；〈繁昌縣監邑公仲實功績記〉（頁15下-17上）。

<sup>94</sup> 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八，頁19下-20下。

亦喜前言之有合也，書於卷首。」<sup>95</sup> 再如李祁〈美俞公新州學詩〉：

今懋齋俞公之來鎮永新也，武事既備，乃撤廟學而更張之。……州人縱觀，駢首嘉歎，以為今之規撫乃自昔所未嘗有者。……於是相率為歌詩以頌公之德焉。<sup>96</sup>

此學之修，另有〈永新州新學記〉記載始末，亦為李祁所作，其文重點亦在褒揚俞茂武事之餘修文之功，而士民又作詩卷，歌頌俞茂之功。亦有如黃潛〈書餘姚新學詩後〉之例：「餘姚學正楊君請於府若州，撤廟學而新之。予友彥實既為作記，歸美其守長；邦人士樂君之志有成，而懼來者之弗嗣也，復相與播之聲詩，以垂無窮之思焉。」<sup>97</sup>「記」用來標榜領銜的地方長官，另以詩卷褒美實際主事之學正的功勞。

同樣地，祥瑞亦有以詩卷、序的形式歌頌，如王旭〈題尹宰嘉禾圖〉：「尹公安陽之政，可謂得民心之和者矣。……禾麥之瑞，不生他邑，而獨在於安陽，則尹君之政，雖欲自晦，不為天下最，其可乎？」<sup>98</sup> 胡祇通〈韓耀卿異花詩卷序〉先提到：「韓侯耀卿治濬州之明年，……所居後圃異卉脫土孤挺而起」，接下來詳細描繪該花之形狀，並說明陰陽感應之理，在未提及任何具體政績的情形下，直接評論：「然則韓侯之德政不言而可知矣」，最後則呼籲：「工畫者寫生於卷軸，長於歌詩者惜贊詠之一言，吾不信也。」<sup>99</sup> 我們在這個例子中既看到如何以祥瑞之現來「憑空」稱揚地方官，也看到有圖有文，以序引詩的組織方式。

### （三）詩卷形式與社交文字

上文提到，頌揚文體常多種並行：既有去思碑，也有餞別詩卷；既有政績記，也有德政詩卷；既有建築記，也有建築詩卷。如果碑、記等是傳統的形式，詩卷等就是元代新興的風氣。上述諸例顯示，當時幾乎可說是無事不詠，而關鍵便在於此一詩卷的形式。「詩卷」集合眾人為同一主題而作之詩，代表的是一經

<sup>95</sup> 元·程端學，《積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2冊），卷二，頁5。周一夔離任時，「大夫士咸詩之」，序亦為程端學所作（卷四，〈送周以韶序〉，頁10下）。

<sup>96</sup> 元·李祁，《雲陽李先生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6冊），卷一，頁184。

<sup>97</sup>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二，頁7下。

<sup>98</sup> 元·王旭，《蘭軒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2冊），卷一四，頁1。

<sup>99</sup> 胡祇通，《紫山大全集》卷八，頁7上-8上。

過組織的士人活動。詩卷在元代應用的範圍極廣，本文無法全論，以頌揚政績的詩卷而言，組織者可以是官僚的親友或門客，可以是地方的士人或官員；作詩的場合可以是集合於一時一地，也可以是透過序引逐一收集；其後，同樣通過題跋模式，不斷增生。除了詩、序，還常合併其他文體如記等，以說明主題，提供作詩者或後續題跋者參考。透過詩卷，地方士人皆可參與其中，並共同肯定、塑造了官員的名聲。詩卷的規模可大可小，如上述唐棣、趙儼等本來便已交游廣闊者，其詩卷或所得贈文亦包含較多的名士。而一些代求名士作序、題跋的例子，則透露使詩卷「升級」的企圖。

上文在討論刻石的去思碑或各種記文時已經提到，它們的文本可通過題跋模式在士人的社會網絡中繼續增加。比起去思碑，詩卷的形式本來就更是不斷增長的，這些以詩、序頌揚的善政美行同樣透過詩卷的題跋，繼續傳佈開來。劉敏中(1243-1318)是元初以文采知名，由中書掾仕至翰林承旨的北人高官，其身分使他成為題跋的熱門人選。以下以他三篇題詩卷的文字為例，簡單說明詩卷作為社交文字的表現。劉敏中在〈書邵知事臚行詩卷後〉中提到，他此前在繡江別墅養病時，聽聞濟南路知事邵文卿之名聲，後僅在劉敏中道經濟南時匆匆見一面，未及深識，因此，他對邵文卿的肯定主要來自贈行詩卷：

今年邵君赴調京師，以其大尹東平瓠山王公、僉憲廣平趙子溫所贈序引詩什見示，徵余言。余謂邵君，瓠山曩居內翰，兼史職，史筆無妄書；子溫簽外臺，為執法，執法無妄與。二公皆謂君練事強力，勤恪清慎，贊佐有成，則余之聞於繡江者為可驗矣。二公之言可以信後世，況吾人乎？況有司乎？吾見吾子之通達變化，由今而後，有不可量者。<sup>100</sup>

贈行詩卷是邵文卿來京師改官時所主動出示，以之作為交游的憑藉，劉敏中當時是集賢學士。詩卷中王構(1245-1310)與趙子溫對邵文卿的稱揚，成為劉敏中肯定邵文卿的主要原因，他先指出王構與趙子溫的地位與其言之可信，從而重複、「證實」了邵文卿的能力。此處王構與趙子溫被賦予權威的地位，其提供的肯定，經過劉敏中的題跋得到強化。又如〈題金監司餞行卷後〉：

於是平陽監郡金公通議入參議中書，時余方承乏集賢，預議事之列，……集賢司直劉君仲傑，其舊識也，一日持平陽士民餞公篇什邀余題，余得其為政之大者，曰獄平而瑞雪降，學勸而習俗革，安地震之變而民生復完，

<sup>100</sup> 《劉敏中集》（收入《元朝別集珍本叢刊》），卷一〇，頁211。

輟歸墓之議而王事是急。去之日，民無遠近，旄倪攀留，號呼嗟泣，先後不絕，如去慈父母。<sup>101</sup>

這位前平陽路達魯花赤的餞行詩卷是通過其相識之人、集賢院的首領官請時任集賢學士的劉敏中所題。劉敏中從餞行詩卷中得知他在平陽任上的善政，並在其題文中再次歸納敘述。<sup>102</sup> 再如〈題杜東臯榆次詩卷後〉，劉敏中居鄉里時，聞附近五縣令之賢聲，其中四人皆為劉敏中之舊交，只有齊東縣令杜濟川未曾識面：

一日杜君介其客張直卿過余，容貌嶷然，進退鬱然，叩之語，辭約而意誠，殆古之所謂惻惻無華者，為加禮焉。君去，直卿言：吾令前為榆次，有惠政，民愛之不忘，形於篇什，乃以示余。余曰：嘻！偉哉！東臯之譽，蓋不可誣。余足以識杜君矣。<sup>103</sup>

劉敏中讀了杜濟川在前任獲得的德政詩卷，從而確認了他之前聽聞的表現。此詩卷是杜濟川之門客出示。這些與前述去思碑的流傳、題跋是同一「題跋模式」的作用，這也可以說明，去思碑作為文本的作用應該放在其他頌揚文體的脈絡中理解。

這些頌揚詩文一方面是士大夫階層的交游表現，另一方面，他們也試圖賦予這些文字頌揚之外的價值。徐明善〈送畢敬甫序〉說明這是士人為民代言：「他日士來告曰：民齎咨涕洟，欲借留不可得也；士則能為歌詩，道願留者之心而洩其思也。詩既若干首矣，子宜序。」<sup>104</sup> 又如李祁〈茶陵州達魯花赤脫因善政詩序〉：

既而州之儒士咸願作為歌詩，以頌公之德于無窮，而屬予為之序。……夫修其德政，以與其民同其好惡者，為政者之事也；而緝其德政，以播之聲詩者，士之職也。以公之善政如此，而不能使之掄揚敷布，以傳于遠，以垂于後，以勸于將來，則為士之職不既荒乎？是皆吾黨之士所當相率而獎

<sup>101</sup> 《劉敏中集》卷一〇，頁207。

<sup>102</sup> 又如蘇天爵，〈書兩淮鹽運使傅公去思詩後〉（氏著，《滋溪文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二八，頁478），在跋文中敘述了原來去思詩歌詠的事蹟，使之得到進一步的傳揚。王沂，《伊濱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8冊）有〈傅夢臣淮漕使遺愛詩〉（卷一，頁15下-16下），可能為該詩卷中之一詩。

<sup>103</sup> 《劉敏中集》，頁210；又如吳澄，〈題程縣尹光州德政詩後〉（氏著，《吳文正集》卷六〇，頁7上-8下）亦先聽聞南昌縣尹程居仁的治績，繼而見其之前在光州所得之德政詩卷，而題其卷，「樂道其善」，再次稱揚，並加入自己的觀察。

<sup>104</sup> 徐明善，《芳谷集》卷二，頁5下。



助之也，故為之序。<sup>105</sup>

這裡清楚地指出，以詩、序頌其善政是士人的職責，是為了使之傳遠垂後。詩亦有其自身民情論政的傳統，如胡祇遹所言：「民俗之於吏政，緘默而無詩也久矣。……至於為士者，是非義理之不知，好善惡惡之不公，而清議亦廢，其見於詩什者，例皆慶官、餞行、生朝，不情過譽，虛美之浮辭俚語，實無足取。……某人過彰德，贈土主達嚕噶齊三詩，士大夫從而和之，遂成巨軸，市井田畝之人詠其言，歌其德，莫不歡忻鼓舞，況白髮老儒思見善政之萬一者耶？」<sup>106</sup> 一方面批評虛美之言泛濫，其所言正透露當時文字社交的各種場合，另方面又肯定文字的「清議」功能。序文的作者因此要強調其文之信：「儒館詩成，屬筆為叙，蓋以其未嘗一迹於公府，紀父老之詞而非佞。」<sup>107</sup> 又如楊維禎〈送海鹽知州賈公秩滿序〉所言：「天下公論不在公府，而恒在閭巷之民，若甚愚，而是非之心則甚白也。邦大夫之政，其失者議於市，謗於道，而其善者亦嘖嘖不容口，故欲稽守令善惡，不察守令，而察閭巷之言，得之矣。」<sup>108</sup> 這種「公論」的實際作用表現在政治領域的推薦：

今太守岳侯不没人善，剡薦兩司，以論公之功。雄之士民咸作詩歌以頌公德，予因歷序其事，以俟夫觀民者察焉。……苟朝廷公論有在，則當使公正笏橫犀，出鎮方面，天下之為臣子者咸慕公所為，將見四海之內，盜息民安，又豈一方一郡之福哉？<sup>109</sup>

可以看到，最後的呼籲是為求升遷。<sup>110</sup> 黃潛也同樣提到士大夫「公論」的意義：

人莫不有是非之心。充是心也，行於朝廷，則為公道；發於士君子，則為公論。公道廢而後公論興，公論息則天理滅矣。敬之以剛直取怒受誣，而臺府為別白其是非，以昭雪之，朝廷之公道行矣。奚以士君子之公論為哉？諸公猶嗟歎之，永歌之而不已者，非專為敬之發也，蓋將使在高位而

<sup>105</sup> 李祁，《雲陽李先生文集》卷四，頁220。

<sup>106</sup> 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八，〈幹哩監司詩卷序〉，頁10上-11上。

<sup>107</sup> 《劉將孫集》卷一四，〈郝廉訪送行詩序〉，頁123；又如陳著（1214-1297）作〈慶元路達嚕噶齊伊嚕通議德政記〉，因「山林遺老，其言必公」，見氏著，《本堂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5冊），卷五一，頁9下。

<sup>108</sup> 楊維禎，《東維子文集》卷四，頁6上。

<sup>109</sup> 劉鶚（1290-1364）《惟實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6冊），卷二，〈南雄府判瑣達卿平寇詩序〉，頁8下。

<sup>110</sup> 又如胡祇遹，《紫山大全集》卷八，〈送蘧錄事詩序〉：「諸公之篇章非妄言也，察行廉者，當細詢之。」（頁7上）

無是非之心，滅天理，窮人欲者，聞敬之之事足以戒也。敬之之事，前序已詳，茲故弗論，獨論其所以不宜無傳，庸俟夫觀人風者焉。<sup>111</sup>

這是黃潛為一「辨誣詩卷」所題，亦即，在此之前，已有士人集體頌揚的詩卷，亦有序文記述辨誣之事始末。黃潛在其題文中強調士人「公論」，則是透過此一議論闡發此種詩卷的價值。「公道」不行於朝廷，便須依賴士人的「公論」，「公論息則天理滅」，意味著士人之論是最後的根據。而在朝廷公道已行，此詩卷之作，非僅為頌揚個人，而更具有一般性地警戒身居高位者的作用。如此，藉由推薦或警告，士人試圖建立其「公論」與現實政治的連結，但其言是否真的能在官僚體系中發揮作用，則未必盡如理想。「公論」的主要讀者仍是士人群體，這既可視為一種限制，但也顯示了士人在政治權力之外建立、維持自身價值體系的努力。

如果這些「公論」是基於「循吏傳統」的價值，代表士人對政治的一種參與，它們被用來作為個人的文件時，受重視的則僅是作為循吏的意象。下兩節將繼續討論其與個人傳記的關聯。

### 三・政治傳記與政績文字的編纂

#### （一）政績記與歷官記——政治傳記

上文討論的，無論百姓或士人，都代表一個群體，但也有作者自身為表彰個別官員而作的情形。如貢師泰所寫的〈興和郡守康里君善政記〉，實為其見江南行臺御史大夫慶童後，慶童之賓佐花仲實為言慶童之子的政績，貢師泰因而將之記述成文。<sup>112</sup> 文中並未特別提到是否花仲實請貢師泰作此文，不過，很明顯地，這是貢師泰個人的恭維之作，而非為表達民之感念。或如吳師道的〈張縣尹政績記〉，記述世祖至元後期蘭溪縣尹張孝安為民申冤，最後卻遭豪民范宇反擊而被罷官的經過。該案牽連受害者甚廣，范宇則成為巨富，甚至得到相當高的官職。吳師道在年輕時曾見過張孝安，寫作此記則是應其曾孫之請：

比歲有自北方來從白雲許先生游，名眉壽者，公之曾孫也。一日過予，為道前事。眉壽亦早失父，畧聞家人言，不能悉也，俾予筆之。予固樂道人

<sup>111</sup>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二，〈題朱掾辨誣詩卷後〉，頁14。

<sup>112</sup> 貢師泰，《玩齋集》卷七，頁34下-35下。

之善，況於張公！且吾州舊為縣時，尹止六人，其賢未有如公者，距今五十年，人能道之。雖其摧擊奸強，志不克終，使果如其志，則吾里數百家善良之禍免矣，可勝恤哉？范勢既消歇，子孫日就破蕩，數年前有坐殺人死獄中者，正向時囚繫冤濫處，跬步不差，聞者快之。今眉壽從師學道，不遠千里，志操卓然，將為時偉器。天之於善惡報施，果不誣也！故為書其槩，非徒表斯人之善，俾世之稔於為惡者，亦有所鑒焉。<sup>113</sup>

因此，此篇〈政績記〉並非代表民之去思，而是主人翁之曾孫來請作，雖以政績為名，實際上是申冤。由其所述看來，結果官府亦未改正，最後只能從子孫的境遇訴諸天之善惡報施，可說是企圖透過文字的書寫來彌補現實中的不公不義。楊舟的〈臨汝記〉亦記載一段地方豪橫之吏為其子求職而逼死臨汝書院山長的冤情，其計雖因行中書掾申屠駟（字子迪）察知有異而暫時中輟（此記即為頌揚申屠駟而作），但申屠駟調官去後，仍得遂行。〈臨汝記〉今不存，但黃潛在其跋中「刪其要而論著于篇」，不僅留下此一事件的始末，也讓我們看到他「哀〔山長〕士元之死，悲子迪之志」卻同樣無可回天的無奈，與吳師道一般以文字來對抗現實中未被彌補的不義，但黃潛甚至無法聲稱「天之於善惡報施，果不誣也」，而僅能「為之掩卷而太息也」。<sup>114</sup> 我們在這兩篇記文中看到頌揚文字背後的黑暗現實，以及「表善」之外也「警惡懲惡」的寫作意圖。

吳師道另一篇〈朱敏平反獄事記〉，記述朱敏任仙居縣、瑞安州、樂清縣及婺州吏時，明察各案、平反冤屈的事蹟，最後提到：「諸公既上其名於薦書矣，今得徵休寧幕職，循常調爾，而旌賞之令未下也，故愚為列其事，庶幾見者或有省焉。」<sup>115</sup> 相對於〈張縣尹政績記〉死者已矣，此記表彰官員之功，則希望他能得到升遷的獎勵。又如黃潛〈跋常掾平反序〉提到府吏常元亨平反一冤獄，其推官「深服其詳敏，自以位卑，莫克論薦，迺序其事而傳焉」，<sup>116</sup> 亦以著作揚名取代國家的升遷。

上述這些記文應該並非刻石之記，其出現或許透露官僚對政績紀錄的需求。這類文字的作用可以從王寔〈敘鎮江路總管李中大夫惠民政績〉略窺一二。這篇敘述鎮江路總管李世安的政績，是在李世安仍在任時所作，且從「常之民王寔寓

<sup>113</sup> 《吳師道集》卷一二，頁 275-276。

<sup>114</sup>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二，〈跋臨汝記〉，頁 4 下-5 上。

<sup>115</sup> 《吳師道集》卷一三，頁 298-299。

<sup>116</sup>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二，頁 13 下。

客于斯也，聞嘉言善行以愜于方寸者縷縷不絕，後當有大手筆頌遺愛以勒堅珉，上太史以著列傳。予非佞也，敢敘梗概，以闡隱微，庶幾為來者勸」看來，此文非應民請，而為作者自作。在文末的頌詩後又附註「至正九年三月四日寫四卷付都省差來官將去。又二卷寄江浙蘇參政」，透露這類作品可能用以向上級官府褒揚地方官。江浙蘇參政即蘇天爵，他後來在為鎮江路修學所作的記文中一開始便提到他早聞李世安之名聲：「至正八年（1348）冬，天爵承命參預江浙省政，聞郡縣官屬有聲者十餘人，鎮江路總管李侯世安其一也。侯到官歲餘，政事修舉，江南行臺御史、浙西部使者往來郡境，民數百人共言其賢。朝廷聞而嘉之，遣使賜金織幣，表侯治效。」我們可以推想，其名聲之傳播，部份即來自如王憲敘文之作。<sup>117</sup>

再有一種是如宋濂（1310-1381）作〈葉治中歷官記〉，因其友鄭玉、屠性、劉文慶三人推崇葉琛（?-1362）之政績，而以長篇細述其歷任政績，如同以政事為主的傳記，其原因則是：「矧如侯者，政行暴著，……可使泯泯哉？夫不知人之善，不知；知善而不能揚，不仁。余雖不敏，頗以文字為職業，不敢啗無一言，謹以所聞於三君子者著書一通，以俟他日傳循吏者宣慰。」<sup>118</sup> 這是在留名青史的價值觀及文人的責任感下產生的著作。宋濂此文作於葉琛在任上時，而同樣歷述一生政績，劉基所作〈前江淮都轉運鹽使宋公政績記〉，則是宋文瓚退休後，「基年少時聞長老論說郡守政績，必以宋總管為首稱。及來越，始獲見公，因訪于越士，得公所行之大槩，錄以為後進式」，<sup>119</sup> 宣稱作此記是劉基個人的意願，希望能提供後人模範。這兩篇也都不是民請記去思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它們都是記載歷任政績，接近傳記的形式，而非單一任上的紀錄。

宋濂本身有其門人方孝孺（1357-1402）為作的〈歷官記〉。鄭楷為宋濂作〈行狀〉時即以〈歷官記〉為重要資料：「竊念先生道德文章固已顯著於當世，而出處遭逢行事之盛，世系遷徙生卒歲月之詳，尚恐人未盡知。爰敢哀取翰林待制

<sup>117</sup> 此文最後再次強調李世安的家世和政績：「李侯世家京師，先參政忠靖公歷任累朝，有聲中外。侯蚤承家訓，長遊成均，由監察御史分憲淮東，擢拜是官。清慎有守，孜孜愛民，陳郡政不便者數十事，治獄訟未決者又數百事。扶壞拯廢，皆勇為之。監郡馬舍謨豈弟樂易，僚案協恭不撓，故其政為稱首。因紀廟學之成而并書之，來者尚克繼之哉。」亦屬於上述建設記文兼表彰個人之類。蘇天爵，《滋溪文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三，〈鎮江路新修廟學記〉，頁43-44。

<sup>118</sup> 《宋濂全集》，頁2011-2017。

<sup>119</sup> 劉基，《誠意伯文集》卷八，頁55下-62上。

王公禕、先伯公太常博士諱濤君舊著小傳，及同門友方孝孺所作歷官記，輯為行狀一通。」<sup>120</sup> 從〈行狀〉作於宋濂去世之年看來，方孝孺的〈歷官記〉很可能在宋濂生時即已作。方孝孺在給鄭楷的信中提到：「功行之詳，只用僕所述歷官記，參以後所見聞足矣。若欲明白公之本心，僕雖無狀，他日不敢辭也。」<sup>121</sup> 可見〈歷官記〉主要記載其事功。這類作品似乎起源較晚，<sup>122</sup> 目前看到的還不多，<sup>123</sup> 如果與上述各種政績紀錄並看，也許比較可以理解其出現的脈絡。傳統傳記本來即以仕宦經歷為主，但宋代以來，不仕士人的誌銘日多，非仕宦的生命主題反而是其時傳記寫作重要的發展。元代生時作傳的例子不少，此類以頌揚政績為主的記文作為個人的生平資料，又轉為另一種以宦跡為重的傳記。

## （二）《辜君政績書》、《甘棠集》與《餘姚海隄集》——政績文字的編纂

上文提到各種形式歌頌政績的作品，它們同具有記錄政績、褒揚個人之意義，亦常為同一場合而作，彼此間互有聯繫，當時也可見到一些集合各篇、編輯成書的作法。

<sup>120</sup> 鄭楷，〈翰林學士承旨宋公行狀〉，《宋濂全集》，頁 2360。

<sup>121</sup> 方孝孺，《遜志齋集》（收入《四部叢刊》第 253-254 冊），卷一〇，〈書·與鄭叔度八首〉，頁 28 下。

<sup>122</sup> 宋代有《韓文公歷官記》。程俱（1078-1144），〈韓文公歷官記序〉提到：「予友彭城陳傳道師仲，少時嘗薰具韓文公歷官出處之槩，凡傳不載而見於他書者，將一二以記。……蓋古之賢士，信道堅篤，其出身從仕，下不為卑賤之所訕塞；既貴，不為高官厚祿之所誘制，而唯辯不苟己，事不苟隨，雖關摧節沮，而終不撓者，如文公可得見耶？故樂記其事而傳之。」（徐敏霞校輯，《韓愈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 7）另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4 冊），卷七亦錄有《韓文公歷官記》，稱「新安張敦頤撰」，此本今不見，從其對內容之批評看來，與程俱本並非同一本。今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中尚存有張敦頤撰〈柳先生歷官記（并序）〉（頁 1429-1434），乃從關於柳宗元的各種文字擷取而成，與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等作的方式相同。這種〈歷官記〉是後代人為歷史人物作譜類傳記，與元人為當代人作一生仕宦紀錄的〈歷官記〉不同。

<sup>123</sup> 另如釋大訢（1284-1344），〈王可毅尚書歷任記〉（氏著，《蒲室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04 冊〕，卷一〇，頁 1 上-5 上），同樣是個人仕宦紀錄，則為王士弘（字可毅）自己請釋大訢作記。記文稱王士弘乃為「視昔之戒懼而加謹焉」，但全文語調亦為頌揚。又明初的嚴震直曾請高遜志為作〈歷官記〉，「以示我後之人」，收錄於後代子孫為其所編之《流芳錄》中。嚴梧鳳編，《流芳錄》（收入劉家平、蘇曉君主編，《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北京：線裝書局，2003〕，第 19 冊）。

例如，《辜君政績書》，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永豐令辜中（一三四八年進士）受代去，縣之父老子弟願以中善政刻諸石，〔永豐教諭陶〕凱因序中政績爲此書，以贈言、學記等篇附焉。」<sup>124</sup>《辜君政績書》今不存，辜中的具體政績也不甚清楚，不過《四庫提要》中提到其附錄的〈學記〉，當為李祁所作的〈信州永豐縣修學記〉，今收錄於其文集中。<sup>125</sup>通讀全文，此記之重心實在褒揚縣令辜中與應辜中之請獨力修學的儒士葉性孫的義行。「贈言」則可能是當地士人餞詩之類的文字往來。

另如為浦江縣達魯花赤廉阿年八哈編的《甘棠集》，收錄士人歌詠之作，同時「他文字之有紀於侯者，具見集中」。<sup>126</sup>《甘棠集》已佚，我們無法知道確實收錄了哪些文字，其相關政績今散見於各文集、方志者，包括收復浦江縣學學田，<sup>127</sup>奉浙東僉憲余闕之命刻柳貫《待制集》，<sup>128</sup>請宋濂作《浦陽人物記》並刊刻，<sup>129</sup>修五賢祠並請戴良作贊，<sup>130</sup>新建婺女星君行祠等。<sup>131</sup>除了這些個別的記載，另有胡助所作，長篇的〈廉侯遺愛傳〉。此文開端首先便標舉出，浦江縣入元以來二十餘任達魯花赤中，廉阿年八哈是唯一「德政愛民與古之魯卓並稱無愧者」。接著在簡單介紹廉阿年八哈的家世後，詳述其任浦江縣達魯花赤的種種政績，最後則說明此傳之作的因緣：

此侯之治蹟尤著者。侯甚愛民，切切在念，無斯須忘去，鬚髮為白。故民

<sup>124</sup>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五九，〈傳記類存目〉，頁538。

<sup>125</sup> 李祁，《雲陽李先生文集》卷七，頁257-258。

<sup>126</sup> 《戴良集》，〈甘棠集序〉，頁56。

<sup>127</sup> 此事有宋濂記文，但不見於今宋濂文集，而收錄於清·善廣，光緒《浦江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上海：上海書店，1993〕，第54冊），卷四，頁49。

<sup>128</sup> 余闕，〈待制集原序〉，柳貫，《柳待制文集》（收入《四部叢刊》第241冊），卷首；宋濂，〈待制集後記〉，同書卷二〇，頁31上-32下。另可注意蘇天爵，〈待制集原序〉：「翰林待制柳公既卒，子貞藏其文若干篇。至正庚寅（1350），浙東僉憲余公按行所部，以浦江監縣廉君清慎有為，愛民重士，乃命刻其文傳焉。……廉君名額能巴哈，字景淵，為至元名相文正王諸孫，家世清白，故治縣有聲。其于賦役，推考均一，可行永久，民深德之。今刻文集二十卷，別集又二十卷，皆公門生宋濂、戴良所彙次云。」雖亦表示廉阿年八哈實奉余闕指示刻書，但仍大肆褒揚其人其政。（同書卷首）

<sup>129</sup> 《戴良集》卷六，〈浦陽人物記序〉，頁59。

<sup>130</sup> 善廣，光緒《浦江縣志》卷一三，鄭濤，〈書五賢贊後〉，頁39下-40上。戴良贊見氏著，《戴良集》卷四，〈浦陽五賢贊（并序）〉，頁37-39。

<sup>131</sup> 《戴良集》卷四，〈浦江縣新建婺女星君行祠碑〉，頁35。

得安其生，輸賦稅外，毫髮無他費。聞侯之去，皆相顧如有所失，或塑像而立生祠，或植碑以表不朽。見者咸慕，以為前此未之聞也。……里父老相與謀曰：侯今去矣，其德澤在人心，遺愛在田里，及吾之身，固思之不忘也，將如後人何？曷屬諸立言之士書之，以垂來世？皆曰然。於是介戴良氏具政蹟，使來東陽謁文於胡助。助……故為之述遺愛傳云。<sup>132</sup>

可見除了立生祠、樹德政碑外，父老又進而請作「遺愛傳」，冀能以傳記這種文字的形式流傳後世。此文是否收入《甘棠集》則不得而知。

上述《辜君政績書》、《甘棠集》等今皆不存，其內容只能據記載推測，今尚可見的《餘姚海隄集》則提供我們一個具體的例子。<sup>133</sup> 據戴良〈餘姚海隄集序〉，此集之編，乃歌頌葉恆任餘姚州判官時修海隄之功：

國朝易縣為州四十餘年，而國子葉先生來為其州判官，行視敗隄，亟與鄉之父老圖所以弭之。迺規貨食，募匠傭，揆日之吉，鑿石為隄，以尺計者總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其視前人之功，可不謂益至矣乎！於是州之民相與誦美之不已，既致辭走京師，請國子監丞陳公眾仲、翰林學士王公師魯為文記其事，而復退率州士之工乎詩者以及寓公過客，作為樂府歌行、五七言近體若干首，以詠歌先生之功於無極。先生之子南臺掾晉哀集為若干卷，將鋟梓以傳，而屬余序之。<sup>134</sup>

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葉晉所輯「未及刊而燬於火」，今本乃明代葉翼「哀綴散佚」而成。<sup>135</sup> 今本未收入上引戴良之序，<sup>136</sup> 而始於序中提到的陳旅〈餘姚州海隄記〉以及王沂〈海隄後記〉，繼為王至〈敕封仁功侯賜額永澤廟記〉，乃記至正二十七年（1267）朝廷封葉恆為仁功侯，賜其祠廟廟額永澤一事，三記之

<sup>132</sup> 胡助，《純白齋類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4冊），卷一八，頁19下-23上。

<sup>133</sup> 葉翼，《餘姚海隄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9冊）為洪麗珠在其博士論文〈元代縣級官員群體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1）中特別介紹的一份此前少受注意的史料。關於其反映的縣級官員治績及其人際網絡，參洪麗珠論文第五章第二節，頁172-187。本文則以之作為各種頌揚文類之集合的一個例子。

<sup>134</sup> 《戴良集》卷二九，〈餘姚海隄集序〉，頁326。

<sup>135</sup>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九一，〈總集類存目〉，頁1739。《四庫提要》稱葉恆為葉翼之祖，不過從《餘姚海隄集》中明人〈海隄集後序〉所見，翼為葉恆子孔昭（晉）之從弟之子，則葉恆非其祖，乃從祖。

<sup>136</sup> 戴良另作有〈葉孔昭為尊公刊海隄集喜而有賦〉（氏著，《戴良集》卷二五，頁290）一詩。

後為賦、騷、樂府、四、五、七言古詩、雜言、五、七言律詩、絕句等各種體裁的頌詩，最後則是黃潛與王禕的跋。據黃潛文集所收，此跋名為〈跋餘姚海隄記〉，<sup>137</sup> 當為跋陳旅之記文。對陳旅記文之題跋，另有李存 (1281-1354) 〈題餘姚州海隄記後〉一文，存於其文集中，<sup>138</sup> 葉翼《餘姚海隄集》則失收。王禕之跋未見於其今存文集中，然據其內容，為《餘姚海隄集》全編之跋，而非僅記文之跋。又據集中楊維禎所作古樂府辭的小序，楊維禎曾應餘姚百姓之請，為葉恆作去思碑，但此碑未收入今本《餘姚海隄集》，亦不見於楊維禎文集中。另丁鶴年《鶴年詩集》中有〈題餘姚葉敬常州判海堤卷（補先兄太守遺缺）〉、〈題餘姚州判官葉敬常海隄遺卷〉二詩，<sup>139</sup> 亦未收入今本《餘姚海隄集》。

今本《餘姚海隄集》雖非葉晉當初所編全貌，但從上可見，葉恆修海隄，有記（後記）及記之題跋，有去思碑，有士大夫頌美之詩（包括後來增寫者），有成集之序、跋。上述《辜君政績書》或《甘棠集》也都包含數種不同文體的頌揚之作，反映這些頌揚文字共同的屬性。此為其子所集，不同於《甘棠集》為地方人士編輯，卻正顯示其對個人的重要性。

《餘姚海隄集》一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收於「集部總集類」（卷一九一，存目），而錢大昕《元史藝文志》則有《海隄錄》於「史部傳記類」（卷二）。無論從戴良〈餘姚海隄集序〉所述葉晉所輯，或今本《餘姚海隄集》實存之內容來看，其收錄為時人詩文之作，當以總集類為宜，性質類似的《甘棠集》，錢大昕即將之歸入總集類（而《辜君政績書》以敘其政績為主，無論《四庫提要》或《元史藝文志》都列入「史部傳記類」）。此一衝突固然可能是因為錢大昕未見原書，<sup>140</sup> 但此一混淆也透露此類總集著作的「傳記」性質，亦即，這些歌詠的詩文成為傳達個人生命事蹟的紀錄。

不拘何種文體形式，對個人來說，這些都是其生命的（正面）紀錄，上文提

<sup>137</sup>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二，頁3下-4上。

<sup>138</sup> 李存，《鄱陽仲公李先生文集》卷二六，頁8上-9上。

<sup>139</sup> 丁鶴年，《鶴年詩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7冊），卷二，頁4下；卷三，頁6上。

<sup>140</sup> 從其小註僅及葉恆子晉編，而未如《四庫提要》之詳：「未及刊而燬於火。宣德中翼復哀綴散佚，以成是編。」看來，錢大昕也許未見其書，而得之於戴良〈餘姚海隄集序〉之類的文字記載。關於錢大昕《元史藝文志》所錄可能僅來自文獻記載，未必皆在元代已流通或出版，參陳高華，〈讀錢大昕《元史藝文志》〉，氏著，《元朝史事新證》（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0），頁285。



到以包括去思碑在內的各種文字來寫傳作墓銘，即是最常見的情況。這些文字與個人傳記的關係，可以從《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錄》和《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清楚地看到。

#### 四・郭郁的《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錄》與《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

郭郁，字文卿，號復齋。約生於一二五〇年代後期，<sup>141</sup> 原籍汴梁封丘，家大名路。從十九歲辟充江淮樞密院令史開始，經河南省掾 (1295)、都省掾 (1298)，出職後歷任宣徽院都事 (一三〇五年，從六品)、江浙行中書省都事 (一三〇七年，正六品)、知浮梁州 (一三一二年，正五品)、任中書檢校 (一三一八年，正五品)、知高郵府 (一三二二年，正四品)、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 (一三二三年，正四品)、僉江西河東道肅政廉訪司事 (一三二四年，從三品)、慶元路總管 (一三二五年，從三品)、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 (一三二七年，正三品)。

郭郁其人，《元史》無傳，亦未有墓銘碑誌之類傳世。上述詳細的歷官資訊來自〈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錄〉一文。此文作於郭郁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任上，郭郁時年約七十，已請致仕，此後的經歷，由於缺乏記載，亦不得而知。我們對郭郁生平的理解，主要來自包括這篇〈言行錄〉的《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錄》以及收錄郭郁所得贈文贈詩的《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以下分別簡稱《郭公言行錄》、《郭公敏行錄》）。<sup>142</sup>

<sup>141</sup> 此據徐東，〈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錄〉：「年十九，江淮省以儒雅辟充江淮樞密院令史。……賢勞幾二十年，元貞元年 (1295) 掾河南省」（頁 1 上-下）往回推算。又黃文仲於一三三一年為《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錄》所作的序文中提到：「今復齋公官躋三品，力猶彎一石，不類七十者，堅請掛冠。」（卷首，〈言行序〉，頁 5 下）

<sup>142</sup> 我用的是據元至順刻本影印、署為徐東撰的版本（氏著，《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錄》、《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21 冊〕）。關於《言行錄》和《敏行錄》的版本和作者，可參飯山知保，〈『運使郭公復齋言行錄』の編纂と或るモンゴル時代吏員出身官僚の位相〉，《東洋史研究》67.2 (2008)：229-254；張國旺，〈《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錄》和《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的版本與價值〉，《元史論叢（第十一輯）》（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頁 403-411。《言行錄》和《敏行錄》過去並未受到注意，楊鐮，《元代文學編年史》（太原：山西文化出版社，2005）有簡短分析（頁 284-285），近年則連續有這兩篇文章不約而同地以之為研究主題：飯山知保一文主要藉郭郁觀

從編輯的目的來看，《郭公言行錄》係為推崇郭郁、幫助其陞遷而作。《郭公言行錄》的主體是福州路儒學教授徐東所作之〈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錄〉（以下簡稱〈郭公言行錄〉）一篇長文，詳載郭郁歷任治績，其前有地方士大夫黃文仲和林興祖的序文，<sup>143</sup> 後為福州路錄事張復〈題言行錄後〉，<sup>144</sup> 其下為〈福州路儒學陳御史臺狀〉、〈福州路儒學舉狀〉兩篇陳御史臺狀，最後並錄郭郁將所購田產立為家族義田的〈義田牒文〉。這兩篇陳御史臺狀，前者為福州路儒學訓導梁奎等五人所上，提到抄錄〈郭公復齋言行錄〉在狀前，「乞賜採擇，特以上聞，宣付史館，紀其勤勞」，說明〈郭公言行錄〉與〈陳御史臺狀〉間的聯繫；後者為福州路儒學者儒蔡潤老等二十餘人所上，因郭郁之政績「已蒙本道廉訪司察舉，未見施行」、「未愜輿情」，因此「欲乞上聞省臺，擢居重任，實付民望」。元代監察官員巡歷地方，「察吏廉貪，詢民利病」<sup>145</sup> 時，民眾可以上言表達民情，此處儒學訓導與耆儒的〈陳御史臺狀〉與〈舉狀〉，正展現此種以「民意」推薦官員的形式。<sup>146</sup>

《郭公言行錄》一書可說是福州路士民向御史臺推薦郭郁之行為的紀錄，透過書中留下的文字，我們可以看到推薦活動是如何進行的。其中有幾點值得注意：第一，〈郭公言行錄〉一文為福州路儒學教授所作，兩篇陳御史臺狀分別由儒學訓導及耆儒所上，可以看出，這基本上是福州路儒學組織的行動。第二，〈郭公言行錄〉如同前述記載歷任政績的「政績記」、「歷官記」，是一篇詳細敘述郭郁政績的紀錄。〈陳御史臺狀〉中強調監察御史舉賢時，「選人當觀平生之言行，舉人當審大節之始終」，因此附上徐東所作「備載平生居官治民事跡」的

---

察元代北方吏出身之官員，作為「以儒飾吏」的例子；張國旺文著重介紹二書的史料價值。本文則希望就二書的形式及其在元代士人群體中的意義進行討論。

<sup>143</sup> 從序中署名可知，黃文仲（「長樂郡古侯」，卷首，頁 5 上）與林興祖（「三山」，卷首，頁 8 下）俱為福州人。而據《敏行錄》中作於一三三一年的〈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復齋郭公愛思碑〉一文，黃文仲署為「承事郎（正七品）福州路侯官縣尹致仕」，林興祖署為「承直郎（正六品）前延平路總管府推官」（頁 97 上）。

<sup>144</sup> 〈題言行錄後〉僅署「建安前進士」，《敏行錄》中〈建安進士張復啟〉提到「叨錄福城」（頁 111 上），而〈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復齋郭公愛思碑〉提到「錄事張將仕復」（頁 99 上），則張復此時當為福州路錄事。

<sup>145</sup> 蘇天爵，《滋溪文稿》卷三，〈浙西察院題名記〉，頁 35。

<sup>146</sup> 元代肅政廉訪司巡歷地方時的職責包括舉賢，參李治安，《元代行省制度》（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872。

〈郭公言行錄〉。上狀之舉結合〈郭公言行錄〉之作，其作用是提供郭郁政績的資料，這支持了上文討論政績記作用的推測。就「言行錄」的文類形式而言，雖然〈陳御史臺狀〉中提到〈郭公言行錄〉是「依朱文公撰《宋名臣言行錄》例，採輯翰林元學士、袁學士、廉訪馬僉事所作碑記，撮其切要，為〈郭公復齋言行錄〉」（頁14下至15上），實際上，朱熹的《五朝名臣言行錄》或《三朝名臣言行錄》是擷取、照錄各種資料的記載，集合而成，<sup>147</sup>〈郭公言行錄〉卻是徐東個人之記述，〈陳御史臺狀〉所稱「依朱文公撰《宋名臣言行錄》例」，僅是強調其作有所根據，「實非諛辭，允諧公論」（頁15上）。〈郭公言行錄〉作為以政績為主、作於生時的傳記，與前述元人所作之「政績記」、「歷官記」，名稱雖異，形式卻相同，可以視為元代同一風氣發展下的結果。第三，關於其資料來源所顯示的各種文件間的關係：〈福州路儒學陳御史臺狀〉中提到，〈郭公言行錄〉「採輯翰林元學士、袁學士、廉訪馬僉事所作碑記」，<sup>148</sup>除了指出資料來源外，此一標舉亦為藉翰林學士等官僚之名聲。而〈郭公言行錄〉本身則提到，知浮梁州時「有昌江誦詠者百，遺愛碣者三，憲司舉事備者五」，任慶元路總管「儒學歌頌之美，耆舊去思之碑，皆有石刻」，以及福建都鹽轉運使時「父老咸嘉公之德，立石頌焉」，以及「國子司業惠山馬公憲閩之日，有曰：文卿……」可以看到，〈郭公言行錄〉是根據其他已有之碑記而作，並於文中提及其他歌頌郭郁的文字。亦即，〈郭公言行錄〉本身便是一份結合此前文字的作品，在敘述郭郁事蹟時，同時借助了諸多作者的聲望。

《郭公敏行錄》則收集郭郁在各地所得到的士人贈詩贈文（包括上述〈郭公言行錄〉中所徵引者），以下依其各任列出：

（一）從江浙行中書省都事改知浮梁州時

1. 杭州名士鄧文原（1259-1328）的贈序及其他（杭州）士人的贈詩（十七首）

<sup>147</sup> 這與前述程俱〈韓文公歷官記序〉、張敦頤〈柳先生歷官記〉是一致的。蘇天爵《國朝名臣事略》即繼承此種形式，元初李肖龍為宋末名臣崔與之（1158-1239）所作的〈言行錄〉（張其凡、孫志章整理，《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頁1-26）是為個人而作之言行錄的一個例子。

<sup>148</sup> 這些碑記今僅見袁桷所作之〈慶元路重修先聖廟記〉，收於《郭公敏行錄》，亦存於袁桷文集中。元明善之文未收於《郭公敏行錄》，亦不見於《清河集》（久佚，今所存極少），其為郭郁所作碑記為何已不得而知。「廉訪馬僉事」難以確定為何人。

(二) 在浮梁州任上

1. 姚疇的〈德政序〉(但無詩)
2. 作者不明的〈昌江百詠詩并序〉(四十五首詩分記不同政績)
3. 慶賀郭郁父郭天祐 (1243-1318) 七十壽辰的兩篇〈壽詩序〉并詩(十七首，作詩士人不限浮梁一地，包括先前杭州士人)及〈後序〉
4. 慶賀郭郁自身生日的〈壽知州郭公詩〉(十二首)
5. 以郭郁之師侯克中寄贈郭郁之詩為本的庚韻酬唱(十首)
6. 當地士人方希愿的〈復齋說〉(自稱「客侯館下且三載」)
7. 當地士人潘東明的〈浮梁州建學序〉(此為「喜而敘其略，以俟當代燕、許者筆之」，《敏行錄》末另附有鄧文原〈浮梁州重建廟學記〉)
8. 〈浮梁橋詩并序〉(後有詩六首，共七首)
9. 代去時途經鄱陽城(浮梁州屬饒州路，路治為鄱陽)，當地士人的餞別序并詩(共八篇)

(三) 在知高郵府任上

1. 離任時李天應〈善政頌并序〉
2. 學校諸生的餞別序并詩(序一篇，詩九首)

(四) 同知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事任上

1. 分司嘉興，地方的餞別序及詩(序二篇，詩二十首，另「民謠」十首)

(五) 僉江西河東道肅政廉訪司事時

1. 〈劉道玄送江西憲使詩〉
2. 〈德政序〉并詩(序一篇，詩三十二首)
3. 各地士人〈問民疾苦〉書并詩(作者二人，詩十七首)
4. 與個別士人的唱和詩
5. 離任時儒學、書院士人群的〈東湖去思〉詩(十一首)

(六) 慶元路總管任上

(七) 福建都轉運使任上

1. 與地方官僚、士人的唱和(包括參與《郭公言行錄》的徐東、黃文仲、張復，以及訓導梁奎、張英、陳康諸人)
2. 地方士人的頌壽詩(四人)

這些詩文之後則是碑記及書啟文字，包括浮梁州任上重建廟學的記，僉江西河東道肅政廉訪司事時的建三皇廟的記，慶元路總管任上重修廟學的記以及離任時的

去思碑，任福建都轉運使時建南臺鹽庫的記以及離任時的愛思碑。

從上述諸文可見：第一，基本上可以說無任無詩文。除了慶元路任上僅見正式的學記和去思碑，其他所有地方皆有士人賦詩作序頌揚的活動。前文所論的餞別或個別事蹟詩卷可說是此一官員與士人詩文社交活動整體的一部份。作者中大量有與學校相關的身分，也可看出當時地方官與地方以學校為核心的士人群的往來方式。

《郭公敏行錄》中因此保留了一些我們原本不會看到的詩卷。元代文集中存有大量的送別詩序，但所序的詩卷現存可見則極少。我們從這些詩序得知當時有一些現在已經不存的詩卷。然而，這些序皆因為名士所作而保留。例如，鄧文原送郭郁赴知浮梁州任的序文收在作者個人的文集中，因此，即使無《郭公敏行錄》，我們也知道當時有此一詩卷。但《郭公敏行錄》中其他的詩卷，缺乏如鄧文原之類名士的序，可說是純地方性的士人往來，若非《郭公敏行錄》，它們通常的命運是隨著作者湮滅。由此可推想，其時當有更多詩卷，僅因其中無任何名士而未留下痕跡。

第二，這些詩文之作，包括各種場合、文體：不僅是離任時的餞別，也有在任時針對個別事蹟的稱頌；不僅有公的場合（地方建設），也有私人的交誼（壽詩、書齋記等）；就作者言，有個人之作，也有集體的唱和。如同黃文仲在〈敏行錄序〉中所言：「可以詠，可以賀，可以紀，可以序。在官爭贊美，既去極見思。文人才士，卷軸知以幾馬馱。」我們通常在文集中所見都是零星留下的序、詩或碑記，透過《郭公敏行錄》，我們才看到這些文字集合在一起展現的風貌與透露的訊息。尤其此為時人自覺收錄成集，黃文仲闡釋這些詩文的意義：「行其行而見於事，善其事而聞於聲，聲成文而詩歌作，詩歌作而二行著於時，而後可謂之真士大夫」，詩文是使其行事（在歷史中）「固定」下來的方式。文末則呼籲：「今以三品而局於一路一道，豈足以盡公大才？廊廟之上，樞機之間，乃可以展布平生之寸忠。」顯現此類名聲製造的現實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早在為都省掾時（1298），郭郁即曾為其友王舜卿之敬親堂詩卷，向翰林學士王惲（1227-1304）請序：「將求詩什於朝士，庶播其清譽」，郭郁並指出：「士志獲伸於知己，後生借重於先進，此理之必然，況嘗趨下風而接清光者乎？不然，幽隱之士烏能名於後世耶？」<sup>149</sup> 可以看出，郭郁對士人間以詩文建立、傳播名聲早有概

<sup>149</sup> 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收入《四部叢刊》第 224-227 冊），卷四三，〈洪洞縣王舜卿敬親堂詩卷序〉，頁 4 下。

念。《郭公敏行錄》中唱和的作品亦主在褒揚郭郁，與其說是純粹交游的痕跡，毋寧說是一種交游政治的展現。<sup>150</sup>

第三，《郭公敏行錄》中，去思碑頌及序類共五篇，知浮梁州一任有姚疇〈知州郭侯德政序〉(1316)，知高郵府有李天應〈上秦郵使君郭公善政頌 并序〉(1322)，僉江西河東道肅政廉訪司事有方君壽〈任江西憲德政序〉(1325)，慶元路總管有曹愚〈慶元路士民去思碑〉(1327)，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有黃文仲〈福建等處都轉運鹽使復齋郭公愛思碑〉(1331)。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收錄於《郭公敏行錄》內，這些德政序、善政頌或去思碑融於其他序、記文字中，共同構成郭郁的仕宦表現。這正是本文將去思碑與其他頌揚政績的文字並觀的最佳例證。其次，郭郁有多篇去思碑頌或序等，這固然可能是他一以貫之的善政表現所致，但鑑於上述郭郁對「社交文字」作用之自覺，或許同一人有多篇去思文字亦可從此一角度理解。<sup>151</sup>

第四，在編排上，詩、序列於前，碑記之文是附在卷末的，例如〈德政序〉（并詩）或〈建學序〉、〈〔建〕浮梁橋序〉（并詩）依時間順序列於前，〈去思碑〉或〈廟學記〉則以附錄形式列於後。這是以士人交游歌詠的文字為主，記文則僅附帶收錄，很清楚地顯示此書的性質。我們可以從傳統書目的分類對此進一步分析。

《敏行錄》在清人的書目中，或與《言行錄》分開，單獨列在集部總集類，或

<sup>150</sup> 飯山知保通過郭郁的個案，分析吏出身的官僚在蒙元時期的境遇。飯山知保已經指出郭郁雖未直接編纂《言行錄》與《敏行錄》，但可能提供資訊、參與其過程（頁 242）；他更進一步從時間上推測，二書之編，是郭郁在失去庇護人河南王卜憐吉歹後的行動。雖然史料不容許有更確切的證明，這個推測確實頗有可能。而本文關心的則是其「形式」：郭郁之所以採取這種方式，應放在元代士人「社交文字」和「交游政治」的脈絡中理解。郭郁收集這些詩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並非在失去庇護人後才開始。

<sup>151</sup> 就目前可見的去思碑或記載，有些一人數碑的例子，特別如李守中（1270-1342）之例，現存即有四去思碑記為他而作，分別收錄於作者的文集及地方志中而保存下來，蘇天爵在為他寫墓銘時，便以之為元代以胥吏入仕的良好典範（氏著，《滋溪文稿》卷一一，〈元故嘉議大夫工部尚書李公墓誌銘 并序〉，頁 173-176）。而如劉賡（1248-1328）於一三二〇年為史郁所作的〈縣尹史公去思碑記〉中提到：「前任歸信也，其民感德樹碑，參議張公養浩既為之文矣。……耆民邢義等，欲效歸信，勒石記德，求文于余。」（李修生，《全元文》第 13 冊，頁 310）除了個人的能力表現外，這種仿效的影響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有些人有較多去思碑。而前文討論出示去思碑的行為，則可以說明為什麼他地之人知道前任的去思碑。這些行為與邏輯結合起來，形成一個有去思碑者容易得到更多去思碑的環境。

被附在《言行錄》之後，視為一書，列於史部傳記類。<sup>152</sup> 總集收錄眾人之作，除了《昭明文選》以來以收錄歷代（或某代）各體（或某體）菁華之作為標準的傳統總集，唐宋以降，各種類型的總集相繼而出，其收錄的標準往往為某種人際關係或某種社交、文化活動，從中因而透露了許多士人往來的資訊。把《敏行錄》放在「總集」的脈絡中觀察，將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其時代意義。就元代而言，如果我們以錢大昕的《元史藝文志》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總集類」所著錄的書籍來觀察，其選擇標準／組織方式，可粗略分為下列數種：

- （一）時代：如蘇天爵《國朝文類》
- （二）地方：如汪澤民《宛陵群英集》
- （三）家族：如許有壬、許有孚兄弟唱和的《圭塘欵乃集》，合鄭東、鄭采兄弟著作為一編的《鄭氏聯璧集》，或他人歌詠一家，如鄭太和編的《麟溪集》「哀輯宋以來諸家題贈詩賦及碑誌序記題跋之類，為表彰義門而作者」。<sup>153</sup>
- （四）事或活動：包括各種主題的詩卷，如褒美的《賜杖詩》，<sup>154</sup> 送行的《送張吳縣之官嘉定詩》，或一地歌頌政績的《甘棠集》，以及各種唱和之集，從周砥、馬治兩人的《荊南唱和集》，到包含多次游宴活動、幾乎囊括元季所有知名文人的顧瑛《玉山名勝集》等。
- （五）以個人為中心，一生各種文字酬唱和贈言（包括序、記、說等）的集合：如張雨《師友集》、<sup>155</sup> 釋來復《澹游集》<sup>156</sup> 等。

上述各類唐宋以來已皆可見，只有最後一類——一個人一生所得贈言——是元代新舉，可以反映元代以來的新發展。<sup>157</sup> 宋代各種唱和集尤多，可以看出當時士

<sup>152</sup> 詳參張國旺，〈《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錄》和《類編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的版本與價值〉，頁 403-404。

<sup>153</sup>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九一，〈總集類存目〉，頁 1738。

<sup>154</sup> 劉因，《靜修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8 冊），卷一一，〈賜杖詩序〉：「至元二十九年春，上賜侍衛都指揮使王公慶端西土所貢雕玉杖。公既捧以拜，天下聞之，作詩而美之者五十餘首，公分為三卷，命某為序。」（頁 14 上）

<sup>155</sup>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一八，〈師友集序〉：「師友集者，張君伯雨所得名公贈言及倡酬之作也。」（頁 15 上）伯雨為張雨之字。

<sup>156</sup> 釋來復，《澹游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622 冊）編於至正二十五年（1365），「皆一時在朝名公卿大夫泊山林韋布知名士與公往來贈遺詩章及碑刻記序文字」（楊璉，〈澹游集序〉，頁 21）。

<sup>157</sup> 宋代已有收集某人哀挽詩文，如為蘇洵編的《蘇明允哀挽》，為韓琦編的《考德集》，但尚未有總合個人人生時所得詩文之編。

大夫間交游活動之盛況。但如果說宋代特盛的唱和集重視的仍是酬唱過程中的文學表現，元代這類個人贈言的收集強調的是其代表的人際關係。《郭公敏行錄》如果放在總集的範疇中，亦可以視作此類。其特殊性則在於，《郭公敏行錄》是以仕途為線連綴而成的，也可以說是歌詠一地政績《甘棠集》之類作品的擴大，<sup>158</sup> 結合多地（多任）的結果。《郭公言行錄》已經是強調人際關係的作品，而如果當作《郭公言行錄》的附錄，放在傳記的類別中，《郭公敏行錄》反映的，是由他人眼中看到的，在交游活動中呈顯的個人，以及透過頌揚呈顯的政治事蹟。

從去思碑到敏行錄，郭郁的例子讓我們看到詩、頌、序、記、碑等各種文字以其頌揚的作用而被收錄在一起。它們有幾個特色：（一）它們是交游文字，是宋元以來士人以詩文交游之風氣的表現；（二）這是政治性的交游（例如：相對於元末著名的士人雅集作品，顧瑛的《玉山名勝集》），<sup>159</sup> 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地方官員與士人間的活動、交游形式，合在一起，也可以說展現的是一種集體的頌揚；（三）不僅是編輯成書而已，我們還必須注意它們被使用的脈絡。

## 結論

通過各種政績頌揚文字，本文試圖觀察的，是產生這些文字的士人互動以及其下的社會網絡與社群文化。本文整理各種形式之頌揚文字，首先希望此一彙集能使我們注意到，當時確有一政績頌揚的風氣存在，其次則試圖呈顯這些頌揚文字底層的士人活動。無論是一開始集體的歌詠與唱酬，或個別詩文持續的流動與題跋，或最終的詮釋與應用，這些頌揚文字都是在士人網絡與社群中運作。政績頌揚之風是元代整體頌揚文化的一部份，而元代頌揚文化則是士人交游文化的展現。

本文始於元代去思碑大盛的觀察。去思碑的建立有兩個要素，一是宣稱代表民意，二是士人的執筆。第一個要素涉及組織動員而化為物質表現的過程，從而

---

<sup>158</sup> 又如明初的《陳氏文錄》：「陳氏文錄者，宦遊東昌之士為今浙江都指揮使陳公作之文詞也。」蘇伯衡（1329-?），《蘇平仲文集》（收入《四部叢刊》第251冊），卷四，〈陳氏文錄序〉。

<sup>159</sup> 參曾瑩，《文人雅集與詩歌風尚研究初探——從玉山雅集看元末詩風的衍變》（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與地方政治的運作息息相關。第二個要素一方面是第一個過程的一部份，另一方面，卻有士人自身寫作頌揚文字的脈絡。元代去思碑之盛行，正開啟了一扇觀察此一文化的窗口。

從當時盛行的各種送行、善政詩卷乃至各種政績記可以看出，去思碑僅是眾多頌揚政績文字的一種。去思碑表達百姓的肯定與情感是其獨特之處，然而，去思碑代表的民情價值被認知、運用，則是脫離其樹立所在的地方脈絡，進入士大夫間的社交網絡。

從去思碑文的題跋可見，去思碑不僅以碑的物質形式立於一地，也以文本的形式流傳於士人之間，與贈序、詩卷、記文等一起作為個人「聲譽」的文字表現。不同於塑造地方集體記憶的紀念碑，在士人網絡中的去思碑成為個人的文件／資本。此一包括去思碑記在內的社交性寫作文化，也許可以更充分地解釋元代文集中收錄的眾多去思碑文及其發揮的社會作用。

這些頌揚文字中的推薦語句透露出它們可能的現實作用，而此一作用必須放在元代的政治情勢下理解。鄭介夫在其著名的〈太平策一綱二十目〉中批評當時的奔競之風：「近年以來，倖門大開，庸妄紛進，士行澆薄，廉恥道喪，雖執鞭拂鬚舐痔嘗糞之事，靡所不為。其有攀附營救即獲陞遷者，則眾口稱之羨之以為能；若安分自守羞於干謁者，則眾口譏之笑之以為不了事。習已成風，幾不可解矣。」<sup>160</sup> 此一批評的制度背景是元代「仕進有多岐，銓衡無定制」<sup>161</sup> 的官僚體系。鄭介夫（以及其他人）所批評的奔競之風，其實以另一種形式展現在本文討論的這些頌揚文字中。鄭介夫下文便接著討論求「名」逐利以及「公論」的重要性：「夫尺寸之名，求則得，不求則不得，人安得而不爭？錐刀之利，趨前則有，居後則無，人安得而不逐？……昔人云：『天下有道，公論在朝；天下無道，公論在野。』甚矣天下不可一日無公論也。公論所在，如鑒空衡平，纖毫不能以容其偽，雖無事於奔競可也。自公論不明之後，美惡妍醜，略無定價，愛憎取舍，一出私情。人非樂於奔競也，其勢不得不然耳。」<sup>162</sup> 我們看到此一論述中「名」與「利」的並置，看到「公論不明」與奔競之風的連結，也讓我們回想到

<sup>160</sup> 黃淮、楊士奇編，《歷代名臣奏議》（臺北：學生書局，1964），卷六七，頁 36 下。關於鄭介夫及其〈太平策〉，參李鳴飛、張帆的〈鄭介夫〈太平策〉初探〉，中國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十一輯）》，頁 390-402；〈鄭介夫生平事蹟考實〉，姚大力、劉迎勝主編，《清華元史（第一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頁 92-123。

<sup>161</sup> 宋濂等，《元史》卷八一，〈選舉志〉，頁 2016。

<sup>162</sup> 黃淮、楊士奇，《歷代名臣奏議》卷六七，頁 37 下-38 上。

前述士人們在寫作頌揚文字時強調的「公論」，提供其所形塑之「名」的價值基礎。

換言之，頌揚文字雖可能有現實意涵，但這類對包括去思碑在內的頌揚文字的運用，則應當放在當時士大夫間往來文化的脈絡中。去思碑與其他文體共同建立名聲，其對仕途的助益是經過這個轉換的機制，而非直接藉由去思碑或任何其他單篇文字來達成。<sup>163</sup> 其底層是一個在社交網絡中界定個人的士人群體，其存在的大環境則是蒙元統治下的「後科舉社會」。科舉在元代之式微，不僅反映出一個不同的仕進體系（「根腳」有關鍵的影響而「吏進」是主要的途徑），同時意味著一個在士人交游中逐漸形成的文化秩序。

《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錄》和《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的編輯，具體展現了這種社交文字使用的現實脈絡和文化意義。《郭公言行錄》收錄的陳御史臺狀顯示「政績記」或「言行錄」之類「政治傳記」可能的政治用途，但其最後編纂成書，仍然是在士人交游文化的脈絡中。從收集詩文的形式來說，《郭公敏行錄》如同張雨的《師友錄》或釋來復的《澹游集》，是透過交游文字來呈現一個人的形象，相對於直接記載一個人生平事蹟的傳記文體，交游文字是透過他人的觀察與評論而展現的事蹟，同時借重了寫作者個人的聲望。這背後是一個更繁密的社會網絡，以及更緊密的文化社群概念，賦予同儕評論在認知一個人時的重要性，並藉由這個過程建立贈文者與受文者（評論者與被評論者）的聯繫。

而從詩文產生的環境來說，《郭公敏行錄》以仕途貫串，是交游詩文集中一種特殊的形式，也透露出當時政治交游的形態。我們在送行詩卷的部份已經看到地方士人如何幾乎是常態性地經過組織為離任的地方官賦詩餞行，這種活動與建立去思碑（以及祖帳送行等）的行為常並行，透露當時已成形的一套「餞行儀式」。但這些餞行活動只是當時官僚與士人之往來關係在臨別時的表現，在《郭公敏行錄》中，我們還看到在任時各式各樣的唱酬，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些頌揚政績文字的底層是一個士人的社交世界。從作者及碑陰立石者的資料可見，建立去思碑的過程中，地方儒學常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在《郭公敏行錄》中，我們看到的主要也是地方儒學士人的身影。不同於在一般傳世詩卷中展示的名士的集合，<sup>164</sup>《郭公敏行錄》呈現了這些名不見經傳（甚至未留在地方志中）的士人的

<sup>163</sup> 例如，憑藉個人關係的推薦信也許是個較直接、有力，也較特定的求進方式。相對於此，建立名聲是一個遠為曲折、漫長的過程，本文討論的頌揚文字即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sup>164</sup> 如王蒙為盧恆繪、以張雨、倪瓚為首題詩的〈聽雨樓圖卷〉等（趙琦美，《趙氏鐵網珊

活動與角色。同樣的詩文活動形式（酬唱宴集、題跋模式等）被廣泛地運用在不同的場合，容納了多樣的士人參與，《郭公敏行錄》讓我們看到的元代士人群體，並非僅是一個名士的世界。在元代的仕宦環境下，我們看到，透過詩卷等文字交游，不仕或地方士人與官僚群連結起來，形成一個士人社群的網絡結構。

必須注意的是，本文討論的官員和政績，僅是元代士人集體頌揚活動中的一種。在元代，我們還看到大量頌揚節婦、孝子、義舉與各種異行的詩卷和序、記、傳等文字。放在各種頌揚活動的整體脈絡中，我們可以看到，首先，從頌揚的對象來說，一般較常得到關注的是孝子節婦等國家旌表的對象。Beverly Bossler 的新作研究宋元時期關於女性（妓、妾與節婦烈女）的書寫，注意到元代士人頌揚節烈孝義等「楷模 (exemplar)」的行為遠盛於宋代。<sup>165</sup> 這個觀察首先提供了元代頌揚活動大盛的一個例證。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這些旌表的類別外，政績也以幾乎一樣的形式和熱情被讚頌，這意味著，普遍性的頌揚風氣本身才是關鍵，而不僅是孝義節烈等模範所引起興趣的變化而已。<sup>166</sup> 對政績的頌揚一方面可以說是對循吏政治的推動，另一方面則是個人生命價值的詮釋。孝義節烈等旌表的類別雖然是用來作為一般人的道德榜樣，但能得到旌表或頌揚的，通常不僅是「典型」，並且須有「異行」，其作為共同模範可說是通過特殊表現而傳達。相對於此，除了孝子這種「特殊」表現的模範之外，就身分認同而言，仕宦作為是男性的一種主要事蹟表現，並且是「一般性」的可歌頌的行為與身分。<sup>167</sup> 在仕途多艱的元代，既突顯了仕宦的價值，也成為一種士人集體參與的方式。

其次，從頌揚的形式來說，詩卷或圖卷的物質形式以及行為上的「題跋模

---

瑚》卷一五，〈王叔明聽雨樓圖卷〉，頁 41 上-54 上）。名士的參與事實上是這些詩卷能傳世的重要因素。

<sup>165</sup> Beverly Bossler, *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3), pp. 365-366.

<sup>166</sup> Bossler 對宋元表彰模範之文獻的統計顯示，宋代約有九十篇，元代四百六十餘篇，元代是宋代的五倍（以四庫全書所收文集數目比較宋元文獻數量，宋有一百零四冊，元僅三十一冊，元不到宋的三分之一）。Bossler 同時注意到，孝子節婦的比重亦出現變化，宋代不到百分之四十是關於女性，元代則有百分之六十六。這個變化對揭示關於婦女之概念的變化很有意義，不過，就頌揚行為而言，即使是看起來似乎「消退」的孝子部份，從絕對數量上來說，元代仍然多於宋代，這顯示的是整體的頌揚風氣的變化。

<sup>167</sup> 當時另一種被歌詠的身分形象則是「隱」，如徐達左的《金蘭集》對徐達左形象的塑造。此非本文主題，無法詳論，但通過此一例子，我們可以看到頌揚文字不僅是在塑造一個「異」於一般人行為限度的「模範」，也作用於一般人可達成、認「同」的身分意象。

式」，是上述普遍性頌揚風氣大盛的主要憑藉。Beverly Bossler 在比較宋元時期關於節婦的寫作時，注意到以「詩卷」形式褒揚節婦是元代的新現象。同時，相較於宋代以傳（墓誌銘或傳記）、記（祠記）為主，詩則是元代歌頌節孝的主要文體形式。<sup>168</sup> Bossler 並指出，宋代與節孝相關的寫作通常基於具體的社會網絡，元代士人則透過這種跨地域、跨時期的寫作，加入了一個文學社群，也反映了他們對漢士人文化 (Han literati culture) 的支持。她認為，作詩、參與詩的社群是在蒙元政治環境中確認士人身份認同的一個方式。<sup>169</sup> 擴大從頌揚文化整體來看，我想說明兩點：第一，詩卷確實是元代大盛的新形式，不過，詩卷所載，並不僅是詩一種形式，而往往包含數種文體，如我們在檢討頌揚政績的各種文體時所見。這是因為「卷」所反映的士人文化活動的複雜化，除了最基本的詩、序（無論是先作以為邀詩之引或後作以為眾詩之綱），也常以記、傳等其他文字提供詳細的說明，作為請作詩、序的憑藉。詩固然數量最多，但其他體裁亦不少，在各種文體中皆可感受到頌揚風氣之增長。也可以說，「卷」的物質形式正反映了可以不斷衍生、增續的「題跋模式」。第二，相較於這個文學社群所意味的對儒家或漢文化的參與，我更想強調這個過程中的社交網絡與士人自身形成名聲的機制。<sup>170</sup> 如果單看對節孝的頌揚，其道德性似乎很明顯，但如果考慮本文所討論的對政績的頌揚，所用之形式如出一轍，或如元初便不少見的〈壽詩序〉，以及五花八門對諸般異人異行異事的歌詠，無論所頌詠的主題為何，更明顯的其實是詩卷所代表的、士人集體參與的文化活動形式。不僅是士人透過作詩作文的活動參與了一個具有身份認同意義的社群（因為作詩文而具有士人身份），這個活動本身便在塑造士人（詩文致贈的對象）的身份意象（在詩文中形成的「名」）。

從去思碑這種褒揚政績的文字出發，本文討論的是「褒揚」，而非「政績」。如果與政治有關的話，是「褒揚」在當時環境中的政治意義。去思碑及其他頌揚政績的文字反映「循吏傳統」對士人的影響，但社交網絡中的政績頌揚，重點不在於「循吏」的實質意涵，而在於「循吏」的身份。從去思碑到言行錄，我們看到頌揚政績的行為在個人生命各個階段的表現：頌揚政績是士人集體的活動，是頌揚者參與政治與社群，也是被頌揚者藉以擴展人際關係的憑藉，其底層

---

<sup>168</sup> Bossler, *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 pp. 365-366.

<sup>169</sup> Bossler, *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 pp. 377-378.

<sup>170</sup> Bossler 亦強調這些詩文提升家庭在地方之社會地位（“social aggrandizing”）的作用，pp. 265-271, 379-392.

是當時士人的交游活動與社會網絡，最後又成為被頌揚者個人的身分形象，則透露了當時交游文化在塑造個人身分上的重要角色。

（本文於民國一〇二年七月九日收稿；一〇三年六月十九日通過刊登）

#### 後記

本文曾在歷史語言研究所講論會報告，承與會同仁師友提供建議，會後並得到一些同仁的修改意見，謹此致謝。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丁鶴年，《鶴年詩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217冊。
- 王旭，《蘭軒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2冊。
- 王沂，《伊濱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8冊。
- 王惲，《秋澗先生大全集》，收入《四部叢刊》，上海：上海書店，1989，第224-227冊。
- 王禕，《王忠文公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第98冊。
- 方孝孺，《遜志齋集》，收入《四部叢刊》第253-254冊。
- 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金石組編，《遼金元石刻文獻全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 丘濬等修，《山東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39-541冊。
- 朱元剛，〈慶元路總管正議王侯去思碑并序〉，傅斯年圖書館拓片 04694 (<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1b/f7/0d.html>)。
- 朱德潤，《存復齋文集》，收入《四部叢刊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84，第71冊。
- 成廷珪，《居竹軒詩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6冊。
- 危素，《危太樸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第7冊。
- 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
- 李存，《鄱陽仲公李先生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2冊。
- 李祁，《雲陽李先生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6冊。
-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 汪克寬，《環谷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0冊。
- 吳師道，《吳師道集》，收入《元朝別集珍本叢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
- 吳澄，《吳文正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7冊。
- 宋濂，《宋濂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 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 何應松，道光《休寧縣志》，收入《中國方志叢書》，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第627號。

- 貝瓊，《清江貝先生集》，收入《四部叢刊》第 250 冊。
- 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 柳貫，《柳待制文集》，收入《四部叢刊》第 241 冊。
- 胡助，《純白齋類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14 冊。
- 胡祇遯，《紫山大全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6 冊。
- 廼賢，《河朔訪古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93 冊。
- 姚燧，《姚燧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 徐東，《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錄》，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21 冊。
- 徐東，《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21 冊。
- 徐明善，《芳谷集》，收入《豫章叢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6，集部第 7 冊。
- 貢師泰，《玩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15 冊。
- 袁桷，《清容居士集》，收入《四部叢刊》第 230-232 冊。
- 烏斯道，《春草齋集》，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138 冊。
- 恩端修，光緒《平遙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山西府縣志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第 17 冊。
- 陸文圭，《牆東類稿》，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 133 冊。
- 陶安，《陶學士先生文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97 冊。
- 許有壬，《至正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95 冊。
- 陳旅，《安雅堂集》，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匯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
-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4 冊。
- 陳基，《陳基集》，收入《元代別集叢刊》，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 陳著，《本堂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5 冊。
- 黃淮、楊士奇編，《歷代名臣奏議》，臺北：學生書局，1964。
- 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收入《四部叢刊》第 239-240 冊。
-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
- 程敏政編，《明文衡》，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73-1374 冊。
- 程鉅夫，《程鉅夫集》，收入《元代別集叢刊》。
- 程端學，《積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12 冊。
- 程端禮，《畏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9 冊。
- 舒頌，《貞素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17 冊。
- 善廣，光緒《浦江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上海：上海書店，1993，第 54 冊。

## 陳雯怡

- 楊維禎，《東維子文集》，收入《四部叢刊》第 245 冊。
- 楊翮，《佩玉齋類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0 冊。
- 葉翼，《餘姚海隄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集部第 289 冊。
- 趙汭，《東山存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1 冊。
- 趙孟頫，《松雪齋集》，收入《四部叢刊》第 229 冊。
- 趙琦美，《趙氏鐵網珊瑚》，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5 冊。
- 虞集著，王頌點校，《虞集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 鄭元祐，《僑吳集》，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95 冊。
- 劉因，《靜修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8 冊。
- 劉基，《誠意伯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5 冊。
- 劉敏中，《劉敏中集》，收入《元朝別集珍本叢刊》。
- 劉將孫，《劉將孫集》，收入《元代別集叢刊》。
- 劉詵，《桂隱先生集》，收入《元人文集珍本叢刊》第 5 冊。
- 劉鶚，《惟實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06 冊。
- 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收入《叢書集成初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第 1 冊。
- 戴良，《戴良集》，收入《元代別集叢刊》。
- 謝枋得著，熊飛等校注，《謝疊山全集校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 釋大訢，《蒲室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04 冊。
- 釋來復，《澹游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 1622 冊。
- 蘇天爵，《滋溪文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
- 蘇天爵編，《國朝文類》，收入《四部叢刊》第 329-331 冊。
- 蘇伯衡，《蘇平仲文集》，收入《四部叢刊》第 251 冊。
- 嚴梧鳳編，《流芳錄》，收入劉家平、蘇曉君主編，《中華歷史人物別傳集》，北京：線裝書局，2003，第 19 冊。

## 二·近人論著

王明蓀

1992 《元代的士人與政治》，臺北：學生書局。



石守謙

1991 〈有關唐棣 (1287-1355) 及元代李郭風格發展之若干問題〉，《藝術學研究年報》5：83-131。

2010 〈元代文人畫的正宗系統——由趙孟頫到王蒙的山水畫發展〉，氏著，《從風格到畫意：反思中國美術史》，臺北：石頭出版公司，頁 167-180。

申萬里

2012 《理想、尊嚴與生存掙扎——元代江南士人與社會綜合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朱迎平

2000 〈宋代題跋文的勃興及其文化意蘊〉，《文學遺產》2000.4：84-93。

李治安

2011 《元代行省制度》，北京：中華書局。

李鳴飛、張帆

2009 〈鄭介夫〈太平策〉初探〉，中國元史研究會編，《元史論叢（第十一輯）》，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頁 390-402。

2011 〈鄭介夫生平事蹟考實〉，姚大力、劉迎勝主編，《清華元史（第一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92-123。

何惠鑑

1983 〈元代文人畫序說〉，《新亞學術集刊》4：243-257。

洪麗珠

2011 〈元代縣級官員群體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徐敏霞校輯

1991 《韓愈年譜》，北京：中華書局。

陳高華

2010 《元朝史事新證》，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

陳雯怡

2014 〈從朝廷到地方——元代去思碑的盛行與應用場域的轉移〉，《臺大歷史學報》54：47-122。

陳德馨

2003 〈從趙雍《駿馬圖》看畫馬圖在元代社會網絡中的運作〉，《美術史研究集刊》15：133-167。

陳雯怡

張其凡、孫志章整理

- 2008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張國旺

- 2009 〈《運使復齋郭公言行錄》和《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的版本與價值〉，中國元史研究會，《元史論叢（第十一輯）》，頁 403-411。

曾瑩

- 2011 《文人雅集與詩歌風尚研究初探——從玉山雅集看元末詩風的衍變》，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楊鐮

- 2003 《元詩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 《元代文學編年史》，太原：山西文化出版社。

鄧紹基

- 1991 《元代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劉馨珪

- 2005 〈從生祠立碑談唐代地方官的考課〉，高明士主編，《東亞傳統教育與法制研究（二）》，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頁 241-284。  
2009 〈從唐代「生祠立碑」論地方信息法制化〉，《法制史研究》15：1-58。  
2010 《唐律與宋代「法文化」》，嘉義：國立嘉義大學。

蕭啟慶

- 1978 〈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氏著，《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頁 1-58。  
2012 《九州四海風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與發展》，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吉川幸次郎著，鄭清茂譯

- 1960 《元雜劇研究》，臺北：藝文印書館。

飯山知保

- 2008 〈『運使郭公復齋言行錄』の編纂と或るモンゴル時代吏員出身官僚の位相〉，《東洋史研究》67.2：229-254。  
2010 〈金元時期華北的系譜承傳與碑刻〉，發表於中國宋史研究會、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華中科技大學歷史研究所主辦，「中國十至十三世紀歷史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十四屆年會」，武漢：武漢大學珞珈山莊，2010 年 8 月 19-21 日。

Bossler, Beverly

- 2013 *Courtesans, Concubines, and the Cult of Female Fidel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hen, Wenyi (陳雯怡)

- 2007 “Networks, Communities, and Identities: On the Discursive Practices of Yuan literati.” PhD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Mote, Frederick W.

- 1960 “Confucian Eremitism in the Yüan Period.” In *The Confucian Persuasion*, edited by Arthur F. Wrigh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02-240.
- 1994 “Social Structure under Mongol Rule.”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and Herbert Frank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638-640.

陳雯怡

## From “Steles for Departed Officials” to “Records of Speech and Conduct”: Laudatory Texts of Official Performance in Yuan Literati Culture

Wenyi Che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steles of appreciation for departed officials” (*qusi bei*, or “steles of benevolent administration,” *dezheng bei*) remain from the Yuan dynasty, while only about thirty were passed down from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ombined.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is Yuan phenomenon in terms of the concept of “social writing”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formation of literati identity. These steles were not only physically erected, but their texts were also circulated in social networks of the literati through various forms of writings. An array of *qusi bei* and related inscriptions, prefaces, poems, biographies, and other genres in which officials were praised formed a kind of “laudatory culture.” Focusing on works dedicated to and about the mid-Yuan official Guo Yu, this article also shows how these various texts depicted a person and became a record of his life. It finally argues that the material form of the scroll (*juan*) and the mode of “postfacing” (*tiba*) were the key elements in this laudatory culture.

**Keywords:** Yuan dynasty, literati, steles of benevolent administration, genre, social network